

SHANGHAI JIU SAN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主办

# 上海九三



## 2018 秋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上海九三

## 上海九三

2018年 第3期

主 编 / 周 锋  
副主编 / 曹正文  
毛时安  
詹 咏

###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毛时安 朱少伟  
刘巽达 张良仪  
邹 勤 周 锋  
宓正明 桂兴华  
殷晓蓉 曹正文  
龚汉忠 詹 咏  
管继平

封面题字 / 谢丽娟  
装帧设计 / 邹 勤  
责任编辑 / 张 瑾

### 主 办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

### 编辑出版

《上海九三》编辑部

地址:上海陕西北路128号  
邮政编码:200041  
电话:62673530  
出版日期:2018年9月30日



## 专稿

■ P03 忠诚担当 亲密合作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 赵 雯

## 纪念

■ P08 “船”奇经历 筑“梦”人生

杨 楹

■ P11 履职尽责 挚诚为民

——从政和议政经历回眸

谢丽娟

■ P15 “智”造中国 建功新时代

钱 锋

■ P19 春风化雨 远航未来

葛均波

■ P22 一座桥与一个统战老兵

袁芸东

■ P24 我与“上汽大众”的不解之缘

项 玮

■ P26 为国家采矿安全能源建设出谋划策

口述:吴价城 整理:王正方

■ P28 春风秋雨过李庄

罗 琳



■ P30 “不苟同,不苟异,不溢美,不溢恶”

## 回眸 ——回忆陈子展教授

徐志啸(特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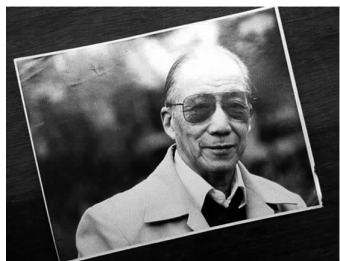
■ P33 中国有自己的麻疹疫苗,因为有他

詹耘 季萍 李培勇

■ P36 村四楼上课的日子

——怀念恩师陈从周先生

刘天华



■ P40 忠魂永驻青草沙

■ P43 伟大的预演

## 钩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筹建与上海

朱少伟



■ P48 新社员名单

## 社务

## 忠诚担当 亲密合作

●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 赵 雯

改革开放 40 年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神州大地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创造了历史性成就。

峥嵘岁月前无古人，伟业丰功举世瞩目。

此生有幸，亲历时代大潮，投身多党合作，见证中华崛起，万千感悟，无尽感激。

### 汗水见证辉煌 忠诚铸造担当

2008 年 1 月至今，十年一瞬。

对中国而言，10 年，特别是中共十八大后的 5 年，是改革开放再出发，创造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现中华崛起的伟大转折期，是承前启后开新篇，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开启习近平新时代的伟大创新期。

对我而言，10 年，是有幸任上海市副市长，始终致力于知识产权亚太中心城市、体育强市和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用汗水见证上海辉煌、见证中华崛起，终生难忘的 10 年。

——辉煌的上海，有闪亮的体育名片、多彩的旅游活动，其间有我的参与和努力。

就任副市长，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09 年全运会、



2014 年 7 月 20 日，赵雯（右二）参加“市长热线”，聚焦体育民生，回应市民关切。

2010 年上海世博会、2011 年第十四届国际泳联世界游泳锦标赛、2012 年上海市民运动会接踵而来，加上其间 F1 中国大奖赛、ATP1000 网球大师赛等国际赛事相继举办，群众性大型活动接连不断。任务之重、压力之大、前所未有，攻坚之难、协调之难、前所未有。

记得北京奥运会组委会青岛会议上，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告诫我们“场馆是基础，运行是关键”，提出“安全第一、服务至上”的要求。我“以百倍的努力、实现百年的期盼”，带领团队亲驻现场近 3 个月，身先士卒，逐项落实全面推进，确保上海赛区“两跑一赛”活动圆满成功，精彩有序，获国际奥委会、北京奥委会的一致好评。

记得 2010 年在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领



2014年11月16日,赵雯(左四)出席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成立宣布会。

塔誉之为“一次非常成功的赛事,绝对配得上高分。”

——辉煌的上海,依靠敢为人先的体制机制改革,依靠卓立排头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其间有我的参与和努力。

锲而不舍,推动知识产权“三合一”行政管理和综合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在中共上海

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下,经过反复沟通、多方协调、积极争取国家支持,上海自贸区和浦东新区“三合一”知识产权局于2014年率先成立。携手国家知识产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创办的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于2016年11月成立。上海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和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2017年先后成立。连续五年向全国政协提交推进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提案,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初步实现。

大胆创新,推进上海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建设。争取各方政策支持,创新邮轮口岸通关监管模式、建立邮轮口岸诚信管理体系,完善邮轮旅游产业发展政策体系,提升邮轮产业服务品质,提高邮轮母港建设和管理能力,延伸邮轮产业链。2015年,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五,2016年跃升全球第四。2016年7月推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与意大利芬坎蒂尼公司签署豪华邮轮《造船合资公司协议》,开启国产邮轮新篇章。

排忧解难,确保迪士尼2016年如期开园。2015年起,多次带领推进领导小组成员,从体制机制着手,协调解决迪士尼游乐设施检验检测、竣工验收、消防安全、周边配套、大客流应对以及外方工程师签证延期、设备入关等难题难事,确保迪士尼2016年6月16日

导下,携手长三角24个城市,善抓接待、细抓服务、狠抓安全,切实保证82.6万车次、66.8万个团队、近3000万游客安全观博、快乐观博,为精彩难忘的上海世博会助力添彩。

记得2011年第十四届国际泳联世界游泳锦标赛首度落户中国、在沪举办,国家关心,世界瞩目,上海的工作令人自豪。赛前,我们协调各方、全力以赴,用短短两年半时间,建成功能齐备、美轮美奂的东方体育中心。赛中,180个参赛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来到上海,全市一条心,精心组织、精心宣传,精心服务、精心保障,确保了赛事安全有序、精彩成功,吸引了全世界35亿人关注。国际泳联为之感动,将“泳动”作为国际泳联新会歌,对赛事做出极高评价。

记得2012年,在逐年提高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构建15分钟体育生活圈,推动全民健身走向社会化、生活化、科学化的基础上,首创市民运动会,数百万群众踊跃参加。2016年第二届市运会如期举行,吸引千万群众参加。至今,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超过47%,上海国民体质综合指数多年来处于全国前列。

记得为助力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全力以赴,确保首次在中国、在上海举办的2015国际滑联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精彩、成功、圆满”。国际滑联主席辛匡

开园、正常运营,助力中美旅游年圆满成功。

破解难题,稳妥推进竞技体育走向职业化、市场化、国际化。2014年,着眼大局、顺应民意,依法依规、多方调解,破解申花足球俱乐部历史遗留难题,千方百计将拥有众多球迷的申花成功易主,留在上海,改制成为上海绿地申花足球俱乐部。改制后,申花不负众望,屡创佳绩。扶持东亚足球俱乐部转制为上港足球俱乐部,篮球、排球和乒乓球也都转制为俱乐部。千方百计推动国际兴奋剂中心落户上海,2016年获得专用土地,2017年列入投资项目,2018年签约落地。

**——辉煌的上海,需要挺身而出,应对急事、难事、突发事,保障社会和谐、城市平安,其间有我的参与和努力。**

2009年“1·30”赴美旅行团发生车祸,6人死亡,10人受伤。我亲临一线,第一时间派出工作小组,第一时间公布事故真相和处理情况,始终把握事故处置的主动权,保证群众知情,维护伤者利益,争取驻美领馆、美驻沪领馆和美国当地政府、律师协助,合情合理、依法处置。

2015年6月1日夜,“东方之星”客船在湖北监利翻沉,举世震惊。6月2日一早即率领上海有关人员赶赴现场。13个日日夜夜,从辨认遇难者身份、安慰遇难者家属,到参与事故原因分析、制定善后处理标准,和同志们一起,直面群众、直面困难,不惧风雨、不顾劳累,亲力亲为、事不过夜,天天忙到深夜。力主统一指挥、及时通报、同命同价,协调各方妥善解决遗留问题,得到国务院和相关兄弟省市的支持和赞同。回沪10天后,重返监利,送上上海人民的深情感谢,赢得民政部、湖北省领导和监利人民的一致好评。

**——感悟:携手共事,担当源于忠诚**

回望10年,若没有中国共产党胸怀博大,与参政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亲密合作,就没有我的今天,更没有我两届副市长的难忘岁月。

我深深体会到,担任副市长,不仅仅是党组织对我

个人的信任,更是多党合作的具体体现和制度安排;不仅仅肩负九三学社组织和社员的殷切期望,更肩负代表民主党派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光荣使命,来不得半点马虎。必须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

我深深体会到,副市长工作,不仅仅是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一盘棋中的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组成部分。参与这一伟大事业,“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任重如山、无上光荣,容不得一丝懈怠。必须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事业。

我深深体会到,当好副市长,“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不忘初心、敬终如始,勇于担责、抓实抓细,临深履薄、崇法守规。必须忠诚于宪法、忠诚于职责。

10年实践证明,忠诚铸造担当,但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作用是有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帮助,才是我“亲密合作、胜任愉快”的坚强基石。对此我心存感激,永远铭记。

### 夯实合作基础 提升合作效能

自担任同济大学校长助理、南汇区副区长、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至今,近20年。自2007年4月当选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主委,连任三届,逾11年。先后与中共上海市委习近平、俞正声、韩正、李强四位书记,与市、区、院校各级中共党组织、各级领导,长期合作,携手共事。

无论是吴启迪校长支持我阻止动用学校资金炒股、阻止与某外地企业合作办学,还是南汇区委书记支持我留任老教育局长、市委支持我更换部门领导,都让我亲身体会到中共各级党委、各级领导对参政党不见外,对自己不护短,真尊重、真信任;对参政党委以重任、听取意见,真协商、真合作。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率先垂范,俞正声书记纳谏如流、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四位书记在相处中关心支持帮助,在工作中放手放心放权,无不历历在目、铭刻在心。



2016年,赵雯(左三)赴上海迪士尼检查开园准备工作。

为。2014年9月,对小学课本删除古诗词等“去中国化”现象,拍案而起,严肃批评,得到中共中央巡视组的支持。

### ——努力提高参政水平,确保履职上坚实

提高参政水平。充分发挥社市委专门和工作委员会的作用,坚持围绕中心、问题导向,坚持调查研究、聚焦重点,更好地完成社中央交办的调研课题、中共上海市委委托的专项

作为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主委、民主党派参与行政的代表,我自觉接受执政党领导,坦诚表达意见,十余年如一日,同心同德,自觉履职尽责,同向同行,促进多党合作。

### ——努力夯实政治基础,确保思想上坚定

从自身做起。加强政治学习,坚定政治信念,提高政治站位,从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工作中、生活上,始终遵守政治规矩、尽职尽责、廉洁奉公、率先垂范。在全国政协,先后提交17篇提案。在中共上海市委专题协商会、情况通报会上,坦诚建言,认真监督。

从班子做起。引导社内各级领导班子和骨干,既要传承弘扬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宗旨,更要思想上坚定,端正“三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提高“五种能力”,为建设高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省级组织不懈努力。

从社员做起。旗帜鲜明地教育广大社员,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弘扬九三学社光荣传统,树立家国情怀,学习尊崇宪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争做先行,多做贡献。

从开展批评做起。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旗帜鲜明地批评错误思潮、错误行

监督任务,更好地组织社市委自选课题的遴选、招标、评审工作,提高课题研究的针对性、可行性。

强化平台建设。发挥九三学社人才荟萃的优势,努力办好“九三学社上海高校论坛”,积极参加基层组织联合举办的“浦江学科交叉论坛”和“知识杨浦论坛”等特色活动,发正确的声音,提可行的建议,树良好的形象,扩大组织影响,吸引界内群众。

要拓展社会服务。以“科普讲坛”为抓手,开展“科普之旅”和“科普讲坛外埠行”活动,构筑科普宣传教育基地,千方百计提高科普教育的广泛性和有效性。扎实推进对贵州省威宁自治县、黔南州和四川省剑阁县的智力帮扶工作。深化与社安徽省委、云南省委、湖北省委和宁夏自治区委的合作共建,推进九地合作、科教扶贫。

### ——努力夯实组织基础,确保组织上坚强

当好班长。做一个有政治定力、有家国情怀、有责任担当、有创新作为,严以律己、以上率下的好班长,坚持班子成员之间坦诚相待、互相支持,通过信息、感情和思想三沟通,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提升班子整体工作效率和水平。

重心下沉。经常赴基层组织了解情况、发现人才,吸收新鲜血液,帮助基层组织解决工作中的现实困难,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主动与中共各级统战部沟通

协调、举贤荐能,加大后备干部的遴选、教育、培训、推荐、使用。

培训队伍。年年举办中青年骨干、新社员培训班,每逢换届,必定举办社市委委员及专工委主任、副主任培训班,举办社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培训班,引领各级班子成员、广大社员,坚定信念,全面履职。

推进机关改革。采取压担子、轮岗位等方式,增强社市委机关中青年干部的服务意识、担当意识、创优意识,强化责任心,提高积极性,激发活力和执行力。

### ——努力夯实文化基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革命传统。利用各种纪念活动,学习九三学社前辈先贤为中华复兴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理想追求、奉献精神,传承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的建社宗旨,宣传社内先进人物的事迹和精神,为广大社员传承革命薪火、实现政治交接奠定基础。

学习传统文化。连续举办6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座,为社员介绍《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老子》《周易》,引导大家了解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及其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为树立“四个自信”奠定基础。

强化宣传阵地。加强对社市委公众号、微信群建设,用及时的报道、鲜活的形式,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中共中央的声音、社中央的声音、社市委的声音,强化对各级组织、广大社员的思想引领、文化引领。

### ——多措并举,提高多党合作效能

新时代,如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完善“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单靠参政党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高度重视、共同努力,深

入研究、认真对待。

我衷心期盼中共上海市委协助参政党树立应有的政治形象。主流媒体应适当增加对多党合作的宣传,对各参政党先进人物、履职成效的宣传,使之有形有声、表达见解、显示作用。在国家政治形象中,树立参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诤友、亲密战友的形象,破除社会上的“摆设说”“应声说”。支持参政党扩大界别覆盖、补充新鲜血液。参政党普遍面临成分同构、成员老化,知识优势不再、缺乏旗帜性人物的严峻局面,亟待扩大界别覆盖、补充新鲜血液,以期后继有人、长期共存,奠定多党合作的组织基础。完善参政党参政履职的制度保障,从制度上、规范上、程序上保证参政党对协商事项、监督事项的充分知情权和监督权。指导参政党加强自身建设。帮助各参政党学习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经验,弘扬光荣传统,突出党派特色,建设信念坚定、薪火永继、作用显著、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40年改革开放,走过来的路洒满汗水,也充满鲜花和阳光,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未来的路还很长,任务更为艰巨,依然需要摩顶放踵、上下求索的努力。

新时代、新征程,再出发路上,我永远不会止步。

我将一如既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提高政治站位,坚定理想信念,焕发蓬勃活力,带领广大社员争做推进改革开放的有志者。立足本职,“以担当求突破,用实干创实绩”,为“加快推进‘五个中心’建设,着力构筑上海发展的战略优势,当好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谱写好中国梦的上海篇章”。带领广大社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履职、全面履职。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查研究,“聚焦改革重点和民生痛点,有效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广听民意、广纳民言、广集民智,为上海当好新时代排头兵、先行者谋良策、出实招”,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上海九三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社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 “船”奇经历 筑“梦”人生

● 杨 樾

我今年 101 岁了,已到了期颐之年。我的人生是幸运的,我生活、成长于这个伟大的时代,亲身体验了中国走向复兴的重要历程,尽管我们的国家还有不少困难、问题,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奋斗,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经打好牢固的基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也取得了长足进展。物质上的牢固基础将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而思想政治、文化上的成长也将为改革和进步提供有效的动力和可靠的保障。因此,我对祖国的光明前途满怀信心。

### 结缘船舶 钟情一生

1926 年,中国正处于大动荡的年代。那年我 9 岁,是我能记事以来所记得的第一次乘船,第一次看到浩瀚无际的大海,海的壮阔、轮船的颠簸,是那样深刻地留在我的脑海,以至于几十年后仍未能忘怀。当时船上乘客的对话可以说是我听到的关于船的浮沉道理的第一课,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特意去看船员们如何驾驶船舶。1927 年,在武昌期间,我曾到汉口和汉阳游览,对长江上的蒸汽机船、木帆船和舢板亦时时留意。中学时代,对于船更感兴趣了,阅读相关文献资料后,以《广东造船简史》为题作为学年论文,文章梳理了广东造船发展的历程,尤其是近代从广东制造局、黄埔制造局到海军广南造船所发展演变的历程,受到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称赞,当时,我便立志把一生献给造船事业以报效祖国。

1935 年,我中学毕业了。父亲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亲眼目睹国运衰微,便一心把富国强兵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在亲友的一致提议下,决定自费送我去英国读大学,选择方向自然是造船业。当时,苏格兰



乘船过葛洲坝船闸时留影(1987)

只有格拉斯哥大学设有造船系,于是,人生旅程的下一站在我面前开启,从此,也开始了我一生与造船结缘的道路。注重实践和动手能力培养是格拉斯哥大学的一大特色,工学院的教学安排每年一半时间上课,另一半时间到工厂当学徒工,这种“三明治”制是当时苏格兰工业界对工程师要求的结果,学生不仅有大学毕业文凭,还会得到工厂学徒工满师证书。5 年的英国留学生活多姿多彩,收获颇丰:我学会了自学方法,养成了好学的习惯,并且培育了独立思考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格拉斯哥大学,我获得了一等荣誉理学士的文凭。回国后,我来到重庆,进入民生机器厂船舶设计室工作,从此踏上了造船实业的谋生之路。除了在民生机器厂任职外,我从 1941 年起,在重庆商船专科学校造船科兼课。1943 年,交通大学接办重庆商船专科学校,造船系成立之时,我被聘为副教授,第二年提升为教授。中国造船工程学会成立后,我又担任秘书工作,之后当选为理事。新中国成立后,我一直服从党和国家对我工作的安排,基本上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在工厂,从学徒、实习员、副工程师、工程师到副总工程师;在学校,从讲师、副教授、教授到系主任,职务变动频繁,任务不断变化,每完成一项任务就有不少收获,既增长了知识,又得到了锻炼,努力把事做好是我的责任。1978 年 9 月任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所所长,1980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研究船是我人生的一大乐趣。上世纪 60 年代起,我

就开始研究船史,撰写《中国造船发展简史》《近代和现代中国造船发展史》《早期的航海活动与帆船的发展》等书稿与论文,到了晚年,出版有关船方面的书便成了我晚年最大的乐趣:2005年,出版《帆船史》和其姊妹篇《轮船史》;2007年,出版《郑和下西洋史探》和《话说中国帆船》;2008年,出版《大航海时代》。可以说,从80岁到90岁,不过弹指一挥间,从各种领导岗位上相继退下来之后,这十年是我写作产量最高的十年,有了更多的时间与自由能纵横驰骋于相伴自己半个多世纪的书桌前。2010年,与陈伯真合著《人、船与海洋的故事》出版,93岁的我虽已不再造船,但我依然在造梦,依然可以坐在电脑前,围绕船的主题、海洋的主题继续着我的著述。

### 心中红船 风雨同行

我名字中的“樵”字,在《辞源》中的注释为:“樵,聚积。诗大雅:芘芘械朴,薪之樵之。”这是当年住在我家隔壁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孙炳文(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时壮烈牺牲)在我上小学时为我取的学名,表达了一个革命者对后代的殷切希望——为国为民发光发热。这是共产党人对我的最初教育,同时,前辈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教会了我怎样去爱国和救国。我没有辜负革命先烈的期望,以忠诚、坚定和始终如一的人格力量为统一战线多党合作事业发挥着应有的作用,那是我心中有独钟的红船,一艘多党合作风雨同舟的巨轮。

我1956年听从在职单位党委领导劝告加入九三学社,任第八、九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第十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历任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十一、十二届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第八届上海市人大常委,第六、七、八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1979年11月25日凌晨,我国沉垫自升式钻井平台“渤海二号”在渤海中部拖航时倾覆沉没,平台上74人中有72人葬身海底,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海洋工程界的特重大事故,引起了国内外的震惊与关注。1980年,我参加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时,以78号提案《对“渤海二号”翻沉事故进行科学调查》提议:“对重大工

程事故要组织科学的调查研究,以深入了解事故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技术问题,这对今后工程的设计、施工、使用管理和保证安全操作均具有重要意义。据说‘渤海二号’在日本使用时曾发生过沉船事故,因此,深入研究该船的稳性、耐波性、强度等,对事故产生的原因作详细分析,将对今后避免再发生类似事故和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均有重要借鉴作用。”不久,国务院批示:“认真研究办理,争取1981年上半年办完。”于是,我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所承担了相关研究任务,共提出5份试验研究报告,为今后设计、制造和管理工作提供了借鉴。海洋石油勘探局也从管理高度总结经验,结合事故调研成果,制定“渤海三号”“渤海五号”操作手册。

作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我一直将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为己任。1995年,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我和九三学社的同仁共同提出了《关于建立约束机制,防止盲目重复引进》的提案,对盲目、重复引进设备和生产线的原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如何建立可行的约束机制共13条建议。这份提案受到全国政协和国家有关领导机构的高度重视,会后,国家计委、全国政协、九三学社等单位联合举办研讨会,取得很好效果。1996年,在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我又领衔提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要走合作发展道路》的提案,这一提案的产生是我组织领导江苏、浙江两省和上海市的九三学社专家用了一年的时间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调研的结果。我们提出: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无论是农业、科教还是工业都具有良好的基础和雄厚的实力,完全有条件成为带动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产业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缺乏总体规划和有力的调控,造成分散、重复和无序。同时,由于资源配置不当,导致人力、物资和资金的损失,从而难以形成具有较强竞争能力和更高经济效益的综合经济体系。要解决这一突出问题,需要两省一市共同规划,走合作发展的道路。这项调查和提案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看来,也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长三角城市群已经跻身六大世界级城市群,区域合作是当今世界地区发展

一大趋势，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只是提上日程研讨而已，更重要的是将有进一步的规划整合，基础设施互联化、区域发展联运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生态保护协作化、联系交往常态化，在地缘、文化和经济等各方面将有着深度的协作。2017年，在我100岁时，我荣幸地被九三学社中央评为“九三楷模”。

### 赤子之心 圆梦人生

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我多年的心愿。我生在黑暗的旧中国，从青少年时代起，我就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留学英国格拉斯哥，那里既是当时英国工业发达地区，也是英国共产党的大本营，在英国期间，我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参加左翼读书会，买到了《共产党宣言》《法国大革命》《西行漫记》等书，以书为友，增长了许多政治方面的知识。解放后，我响应国家东北招聘团的号召到大连工作。1954年，在大连工学院任教期间，我提出了入党申请，此后，调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交大党委书记一直关心我的入党问题，至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我国民主党派的队伍得到空前的扩大。经当时的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教授张鸿介绍，我加入了九三学社。入社之初，首次参加九三学社市委会议，李林（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的女儿，中科院院士，超导物理学家）和张鸿的争论是我经久难忘的往事。李林认为：“必须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否则谁也不会听你的。”张鸿则认为：“帮助他人政治上有所提高，在学术上取得更多成就，在社务工作上花一些时间与精力，也是值得的。”我认为，他们讲得都有道理、都是实情，诚挚而坦率。专业与社会工作的矛盾虽是难解之题，但也应尽可能地两者兼顾，同时，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实践调研，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不正是和平年代为国为民发光发热的最好方式吗？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及负责人，我一直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亲见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作用及成就。

早在1954年，我在大连工作时就当选为旅大市第一届人大代表，后调来上海工作，很快又当选为上海市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几十年活跃在人大与政协的舞台上，颇多感慨。记得“文化大革命”前人大政协开会，大家发言基本是表态拥护领导的决策，每个大单位都有代表介绍本单位的具体工作经验和成绩，有的妇女代表还交流自己的家庭生活，内容可谓丰富多彩。但人大主要职责是立法和监督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当时立法工作较少，印象中只有在制定宪法和婚姻法时组织过多次讨论。那时是按政策办事，甚至是长官意志决定一切。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还有人称“人大举手（赞同），政协鼓掌（拥护）”。改革开放以来，人大和政协开会讨论时，代表委员们批评时弊的发言多了起来，还有不少对领导决策持不同意见的发言。例如，对上海宝钢的建设，讨论要求每个人年植树一棵的绿化运动和每个大企业都建立培训中心等建议时也有不少人反对。这些事实表明，人大政协的民主监督程度有所增强。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将从九三学社上海市委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前，我又一次向组织提出了书面入党申请，经组织批准，在我走近80岁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圆了自己几十年的梦想，我的人生经历让我深深地感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只有国家强大了，个人才有前途。

时光荏苒，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党外人士座谈并共迎2018年新春时，提出“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的“四新”要求；两会期间，习总书记在参加政协联组会时，又提出“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新的表述，这是中国向人类政治文明贡献的非常重要的经验，这个制度适合于我们中国社会，适合于我们中国的文化，也适合于我们中国的国情。这一制度在不断地完善，形式也越来越规范。70年来多党合作的历史成就、历史贡献值得我们回顾，重温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牢记使命，保持我们的初心，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努力，发挥党派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上海九三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原副主席、社上海市委原主委）

## 履职尽责 挚诚为民

——从政和议政经历回眸

● 谢丽娟

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我国经济社会蒸蒸日上、民主政治不断进步、多党合作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我非常庆幸生活在这个伟大时代，亲身经历国家的繁荣昌盛，深切感受民主党派地位与作用的日益提高。我为自己能见证这一切并有幸参与其中而感到由衷欣慰。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由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走上了医院领导岗位，继而当选为卢湾区副区长；1985 年 7 月经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副市长，历时 11 年；后又在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上任职 11 年。组织的安排、人民的重托，让我时刻告诫自己，要尽心竭力、勇于担当、勤政为民。

### “把城市卫生管起来！”

1985 年，新任市长江泽民主持第一次市长办公会，对副市长工作明确了分工，要求各自负起责任，做好分管工作。会后，江市长带我们去康平路办公室看望老市长汪道涵同志。当时汪老在说到上海的城市环境时，用“真脏”二字来描述，并直对我说：“丽娟同志，你要赶紧把这个城市的卫生先管起来！”我听后深感此项工作的紧迫性。朱镕基同志甫任市长时，也曾紧皱眉头感叹道，上海这个城市“真脏”。我深知要改变上海“真脏”的现状，不仅要花大力气，还要有新办法。

当时市区政府各部门主要精力是抓经济，环境卫生意识普遍不强，而城市环境卫生的基础在街道。为了发动基层，我与市爱卫办的同志商定，采用插彩旗的激励办法。每月经评比，为各街道分别插上红色、绿色、灰色不同旗子，并登报公布，确有收效。获红旗的很累，插



灰旗的很没面子，便有人抱怨说，应该一级管一级，市里不应该直接管街道。而事实上是区政府管街道怕“痛”而松懈，市里主要是督管。没过多久，有些意见传到了朱镕基市长那里，他微笑着对我说：“听说下面对你的意见很多，不过我对你的工作还是支持的。”这句话既鼓励了我，又激励我要注意改进工作方式。

朱镕基说的“支持”是实实在在的。当时，为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克服畏难情绪，我提议请朱市长带领市政府各委办局领导和区长们到基层突击检查环境卫生，不久，就选定了整治任务很重的南市区。那天在清扫完堆积很久的垃圾后，朱市长带领大家来到附近居民区检查卫生，当时看到弄堂内污水遍地，期间置有数块砖头供踩踏行走，恰巧有位老太太从家里出来，冲着朱镕基就说：“你是市长啊？你看看，我们每天就是生活这样的环境里，有一次小孩去上学就摔倒在这种地方。”朱镕基满怀歉意地表示：“对不起呀！老人家，是我市长没当好，让你们进出这么困难。”走出弄堂，他就

地现场开会,先责问这里的区长是谁?接着便严厉地要求立即整改,在场所有同志特别是各区区长都深受教育。此后,全市上下扎实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如在孟建柱副市长的支持配合下整治了马路菜场,开始拟订“菜场入室”计划;在夏克强副市长的支持配合下整治了建筑工地,拟订建筑工地卫生标准。此外,商店有“门前三包”规定,对市民都有不准随地吐痰、乱扔烟头等卫生守则,并配有处罚规定。

经过各级领导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上海的城市环境卫生有了很大改善,于1990、1992、1995、1996年4次被评为“全国十佳卫生城市”,且名列前茅,我也因此获得了“全国十佳卫生城市市长奖”。

### 入托入学巅峰考验

上世纪50年代初,因“光荣妈妈”造成了生育高峰,导致了80年代初第二代生育高峰。1984年起,上海的托儿所、幼儿园持续爆满。那年我还是卢湾区副区长,在区教育局遇到一位抱着孩子、要求解决入托问题的父亲。这位同志非常冲动,靠在三楼窗边对工作人员说:“你们解决不解决?若再说不收,我就把孩子扔下去!”他在无奈之际产生如此极端的反应,令我十分吃惊,深感解决儿童入托入幼的急迫性。

因此不管在区政府,还是后来到市政府工作,我都把解决入托入幼问题列为重要任务。在摸清入托入幼难的情况后,由政府相关部门发文件,要求现有的托儿所、幼儿园扩增名额,督促各单位兴办幼托园所——大中企业要自办,街道、居委也要办,高校、医院等事业单位都要办。我还明确提出:“假如该办的没有办到位,领导干部家的入托入幼名额要让出来!”当时教育与卫生部门的领导认为此事很难办,无法解决全部入托入幼。为此,我把曾发生在卢湾区教育局的那一幕告诉他们,并坦率地表示,你们都是党员干部,我有许多方面需要向大家学习,但是对解决入托入幼难的事,我比你们有决心,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结果,先前有畏难顾虑的同志被我的话打动了。经过各方齐心协力,市区(县)两级都建立了幼托办公机构。除了公办幼托园所

充分扩容外,工厂、街道以及居委都来挖潜,有的地方甚至将地下人防设施改造利用,最终使入托入幼难的问题得到解决,维护了家庭与社会的安定。

度过入托入幼高峰后,小学的入学高峰接踵而至。自1988年起,上海市每年要净增大约6万名小学生。为了应对严峻的入学高峰,当时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采取上、下午“半日制”,即两个班级的学生使用同一间教室上课,每个班使用半天,学生只上半天学;二是实行三班两教室,这种方案可能会影响教学质量,并将使许多小学生挂着钥匙半天流散在外,处于无监护状态,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为了维护学生的安全与教学质量,维持“全日制”上学,市教育局准备采取扩大班级学额、加快危房校舍改造,以及校舍加层、加快新校舍建设等多项措施,以缓解入学高峰,但能否全部落实还是有问题,于是在给市政府的报告中写上了“争取维持全日制上学”。当市长办公会议审议此项工作时,我要求把“争取”两字删去,以确保小学生都能“全日制”上学。我在会上陈述了“全日制”能否落实的利害关系,表示只要综合措施得到保障,“全日制”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还建议把“落实综合措施、确保‘全日制’办学”列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时任市长江泽民同志听后当即同意,删去“争取”两字。此后,在教育、建委、财政以及区县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这一实事项目,并在年终市民对市政府十件实事的评议中获得最高分,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 遏制“甲肝”大流行

提起30年前在上海爆发的甲肝,许多人至今仍记忆犹新。1988年初春,上海爆发突如其来的甲肝,发病人数急剧攀升,各家医院人满为患,不少企业的库房及部分学校被征用为“临时隔离病房”。

疫情爆发前两周,我和时任卫生局局长王道民同志获悉多家医院出现急性胃肠炎病人,且就诊率升高,经调查发现,多数患者均曾生食毛蚶。出于医生的职业敏感,以及有甲肝爆发之可能的预判,我立即要求职能

部门做好一系列准备工作,紧急下令禁售毛蚶,卫生部门加强防疫措施,医院尽快腾出床位。不久各家医院就诊人数日日攀升,曾有2周时间每日都有1万数千例,直至2月初始有下降,到3月上旬,疫情趋于正常。持续2个月的甲肝感染者逾35万人。

在抗击“甲肝”过程中,我承受了极大压力,除疫情之烈外,还有怀疑和责难,可谓身心俱疲,经常耳鸣甚至重听,但是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自始至终给予我高度信任和支持。时任市长江泽民同志对甲肝疫情十分关切,即便在北京开会仍每天电话听我疫情报告。有一次,他在电话里问:“对尽快控制疫情,还应该怎么做?你有什么想法?”我当即表示,希望召开全市党政干部动员会,以便统一思想 and 行动。他马上应允,一回上海就筹备会议并做动员部署。此后,全市干部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对病灾的扑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泽民同志为了减轻各种质疑对我的压力,亲自去政协做解释工作,他说:“这是一场突发的病灾,上海凡有什么大事,要说责任,都是我这个当市长的责任……”1988年4月下旬,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在即,市政府也将换届。在选举前一天,时任市委书记江泽民非常温和又恳切地找我谈心,要我正确理解甲肝爆发的“领导责任”,要相信组织,共同过好这个关。于是在选举前每人表态的六分钟里,我非常沉重地表示应承担“领导责任”。选举结果,我获得高票当选。

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除甲肝事件本身获得的宝贵经验外,还成就了党外人士接受中共领导、荣辱与共、合作成事的时代范例。

### 生命保护神——“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1988年12月,住在新华医院的14位白血病患者家长联名写信给朱镕基市长和我,反映他们无法承受高额医疗费,呼吁救救他们的孩子。

我随即带领市卫生局、市红十字会等联合走访部分患儿的家长,对他们所承受的经济上、精神上乃至人财两空的巨大压力感慨不已。此后由市教卫办牵头与卫生、教育及红十字会共同商研,与保险公司合作拟订

投保方案,写出了可行性报告。

报告送市委常委会讨论,大家议论纷纷,有些意见认为既然是保险又有政府部门参与,这是不妥的。会后,我们再予以商讨,一致同意,自1991年起,由市红十字会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联手推出非盈利性的“少儿住院医疗保险”,每个孩子投保6元,若因病住院可报销一定比例的诊疗费,费用越高,报销比例越大。1996年后终止与保险公司合作,改称为“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属非盈利性的社会互助基金,被孩子们称为“生命保护神”。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运作至今已22年,享受的范围已逐步扩大到非沪籍在沪就读生及外籍人士的子女。20多年来,累计参保约4000万人次,为近160万人(次)患病少儿支付了16.6亿元医疗费用,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但其间曾遇到的困难不少,如曾被国家教委认为“乱收费”等。

2017年1月14日,中华医学科技奖颁奖大会上,中华医学会会长陈竺对“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社会效果予以充分肯定,指出它的良好运行为国家层面设计大病保障制度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借鉴,并给我颁发了“2016年中华医学科技奖卫生政策奖”。我深知“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发展过程是市红十字会、市教委及卫生部门齐心协力合作的成果,也是社会无数家庭支持的结果,这奖项理应共同分享。

### 破解教师住房之困

1994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在大连召开全国教师住房工作会议,推动中小学教师住房解困。会上重点介绍了大连市改善教师住房的先进经验。我想上海中小学教师住房困难理应尽快缓解。在与市教委商研后,准备使用部分城市教育附加费资金,再由政府财政出资一部分,通过三年努力建造两幢教师楼,率先解决人均4平方米以下的教师困难户,并要求列入市政府的实事项目。这项计划在市长办公会议上讨论时,得到与会者的认同。但事后,我发现实事项目草拟书上并未被列上。我深知,如上不了市政府实事项目则落空几

乎是必然的。于是，我一再去游说有关部门，强调教育是战略重点，教育的主体是教师与学生，为教师解困理应在各行业之首，坚持要求协调解决。最后，这项计划终于被列入了那年市政府的实事项目。通过各方的理解支持和共同努力，使当时上海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以下的教师住房优先得到解困。据统计，到1995年末共有2414户教师的困难住房得到改善。当时住宅楼开工和竣工的喜庆场面至今仍难以忘怀，成为美好的回忆。

### 为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研与呼

解决住房问题是上海市民长期来梦寐以求的企盼。2003年后房价持续走高，而动拆迁过程中货币补偿与实际房价以及动迁居民的心理价位相差甚远，加之各级政府和社会舆论在住房消费上存在产权化、市场化等误导，对于房产市场应租售并举、住房消费应梯度化等理念匮乏，致使矛盾突出。

经与市政协专委会共同调研住房市场的各种现象，回顾供房体制的历史沿革，我于2004年向市政协提出《关于调整本市供房结构租售并举的建议》。2005年，我的提案《完善住房租赁体系——“安居”应有之举》，得到时任市政协主席蒋以任同志的肯定，被市政协主席会议列为重点追踪提案。

于是，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与市政协专门委员会联合开展了专题调研。我们召开不同阶层群众的代表座谈会，青年白领们在会上反映，他们凭正常工资收入根本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享受廉租房政策的市民则反映门槛太高，且真正能获廉租房居住的还不到根据政策应受益人群的1%。在此基础上，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和市政协联合举办了“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研讨会”，提出了住房供应须租售并举、建立政府保障和市场供给相结合的住房供应体系等建议。这次研讨会邀请了建设部住宅司司长、新华社上海分社以及部分兄弟省市的有关领导出席。会上，那位司长对本次研讨会作了热情地肯定，并把会议相关资料带了回去，后来在建设部制定的有关文件中采纳了这次研讨会的一些成果。新华社上海分社也对此次会议讨论的议题和提出

的建议作了内参报道。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和市政协人资环建委联合撰写了《关于上海市房地产形势发展》的市政协常委会建议案，明确提出“住房供给不能全盘市场化”的观点。建议案对政府的有关政策制订提供了战略思考和具体意见，特别是要求政府应对保障性住房建立相应的制度。建议案对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舆论推动作用。

2006年初，在市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我对市房地局于2005年曾表示同意研究发展房屋租赁市场，但在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中只字未提表示质疑。通过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和市政协的共同努力，也包括我个人直接递送自己的观点和有关调研资料给市委书记和市长，终于把“发展住房租赁”写入了市政府工作报告，推上政府的议事乃至办事日程。

回想整个过程，从2004年起只有少数人认同，直至几年后政府与社会逐渐认识趋同。但由于当时政府的政绩固守在GDP，因此，房产市场与市民收入不协调，房产市场与诸多经济、科技等发展不协调，制约了租赁市场的发展，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持有房产产权的比例超过了发达国家国民拥有产权房的比例。因此，我和市政协专委会的研与呼，投入精力多，产出效果还是受到了制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每一段历史，都有各自的主题；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故事。当前，我们身处日新月异的时代，面临全面深化改革的机遇和挑战，虽然履行职责的时代主题在变、期望要求在变、手段方法在变、人物角色在变，但是我初心不改、情怀不变，同心同行，忠诚担当。能有机会得到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九三学社组织的关心支持，许多同事和同仁的热情帮助，我做成了一些事，这些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实践特色和制度成果。我虽已退休，仍将尽力发挥余热，这份热不论多少，应该都是正能量的。■上海九三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原副主席、社上海市委原主委）

# “智”造中国 建功新时代

● 钱 锋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好工作”，无论是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高校管理者，还是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兼职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对此坚信不移、笃行不怠。

回首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航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的光辉历程，回顾九三学社与中国改革发展同行共进的数十载，我不禁深有感触：“作为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子弟，能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见证者、亲历者和推动者，何其有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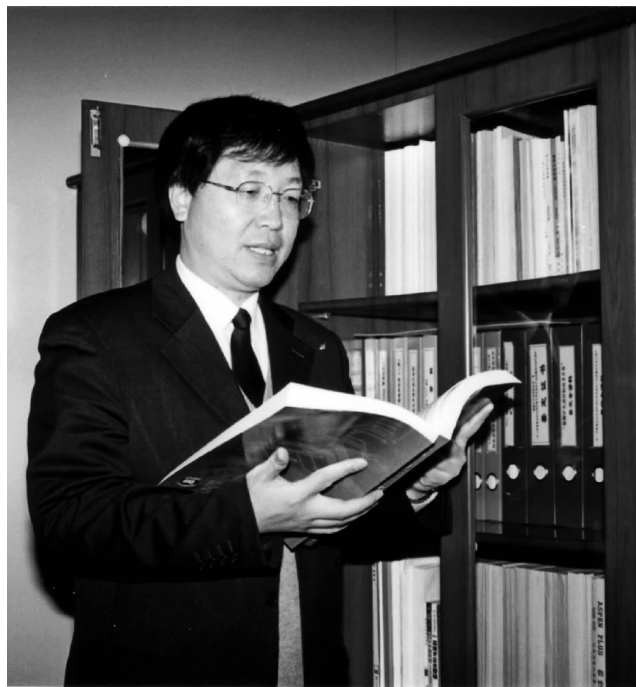
## 矢志创新 “智”造工业

1977 年恢复高考，对正值求知若渴年华的我来说，恍如开启了成长路上的一个新世界。

1978 年初，作为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如愿进入南京化工学院化工自动化及仪表专业学习，也因此幸运地登上了改革开放的高速“知识列车”。本科毕业分配在工厂工作四年多后，我考入华东化工学院（注：1993 年更名为华东理工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上世纪 80 年代末，我国工业化进程迅猛发展，虽然微型计算机的出现及其在化工过程控制中的应用水平不断提高，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很大差距，我为此深受触动。1990 年，我又在职继续攻读了工业自动化专业工学博士学位。

对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如果说改革开放的窗口让我们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未来可能性，那么，



浓厚的家国情怀则是激励我们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回应祖国发展需要的重要驱动力。经过慎重思考，怀着科研一定要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和企业实际需求的信念，我选定了过程控制和过程系统工程领域，开始了长达数十载的埋头攻坚。

创新是科技工作者的第一使命。当时，我国石油化工制造装备严重依赖进口，总体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很大，普遍存在国产化程度低，消化、吸收、再创新不够等问题，亟待通过自主创新，改变受制于人的局面。

1995 年，刚刚博士毕业的我来到中国石化扬子石化公司，开展一个计算机先进控制项目的创新研发。我发现工艺、装备及自动化系统等全进口的乙烯生产装置中，丙烯精馏单元塔釜损失的丙烯产品较多，但是毛病到底出在哪里？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什么？一时难得其法。

那段时间，即便是吃饭睡觉，我都在思考潜在的解



钱锋(左二)在中国石化扬子石化工业装置现场工作

决方案，抓紧一切时间周而复始地进行着数据分析、工艺流程机理和自动控制系统机制的模拟仿真研究，进而研究设计了多种自动控制方案，并与企业操作人员、技术人员和工程人员等进行深度交流和工业装置现场测试，经过再修改、再计算、再调整……最终从众多错综复杂的研究设计方案中找出最佳组合，铺设出最佳途径，在对原有生产装置不改造的情况下，通过计算机先进控制和优化操作，降低了生产过程的物耗、能耗，提高了装置产能和效能。那时，工作至深夜一两点钟是常态，甚至家人习惯于“如果回家吃饭，记得打个电话回来”这样在常人看来有些颠倒的话。如今回首，依旧感怀不已。

天道酬勤，久久为功。21 世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和中国的转型发展形成历史性交汇。新旧动能转换，挑战即是机遇，我和团队瞄准石油化学工业的智能优化制造，针对乙烯、精对苯二甲酸（简称“PTA”）、炼油等重要的代表性石化装置，创新性地将化工过程物质转化机理与装置实时运行信息相融合，进行石化装置智能建模、先进控制和实时优化运行技

术的研究开发，完成了中国首项自主创新的乙烯装置优化运行技术与软件研发，并在国内乙烯行业全面推广应用，打破了我国乙烯行业先进控制与优化技术长期依赖国外引进的局面；在国内率先开展 PTA 装置全流程优化运行技术研究，取得了多项填补国内空白的独创性成果，为大型 PTA 装置成套技术自主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的科技创新工作获得了国家多项荣誉奖励——除了获得 4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0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20 余项省部级科

技奖励之外，我个人还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全国发明创业奖，以及上海市科技精英、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发明家等荣誉，先后入选了首届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973 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并于 2015 年 12 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当下，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已经在智能制造的理念指导下，提出了各自的国家工业智能化规划。无论是对接“中国制造 2025”战略，还是瞄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目标，对高校科研工作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路都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流程制造业，在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数字化、自动化、网络化发展过程后，正在向智能化迈进。而将传统制造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正是我们团队瞄准的努力目标。

实施工业智能制造，最关键的因素是观念的转变——工业智能化绝对不是简单的让机器变得更加自动化，而是一种思维模式的转变，需要一群具有同样思维模式的人协作，实现整个制造流程的变革。登高则可望远，望远而致思深。我认为有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解决目前流程工业在经营决策层面、生产运行层面、能效安全环保层面以及信息集成层面存在的瓶颈问题，推进以高效化、绿色化和智能化制造为目标的流程工业稳步发展，实现全局生产、管理以及营销模式的变革，是流程工业实现高端制造的关键所在。而以“智”为引，继续探索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应用于工业装置，助推现有的工业制造向智能化方向提升，也是我将为之不懈耕耘的“远望”。

### 咨政建言 “智”惠民生

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成员主体，是九三学社作为参政党的特点与优势，如何发挥其所具备的新型“智库”功能，达成以“智”启政、以“智”惠民的参政议政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7年我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市委青年委员会主任，2010年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兼职副主委。至今，参与民主党派管理工作已逾十年。同时，2003年至2007年我担任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从2008年至今，担任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委员会委员。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为此我要求自己必须不断加强政治学习，深入调查研究，关注社情民意，积极建诤言、献良策，始终把履行好委员咨政建言的责任放在首位；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方向，保持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鉴别力，在思想、行动上保持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合辙、合拍、合力。

这些年来，我秉持“勤于思考、乐于建诤言”的精神，紧密围绕国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以及上海市建设“四个中心”、实现“四个率先”、建设全球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组织九三学社社员深入开展参政议政课题调查研究，先后组织和参加了多项九三学社市委重点课题与常规课题的调研，不断提高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能力。其中，2008年，我作为负责人主持完成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会课题“着力推进科技世博的若干建议”，研究成果受到上海市委、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的高度重视，相关建议得以落实。

此外，围绕发挥上海九三学社优势，更好地彰显九三学社社员的社会价值这一定位，作为兼职副主委，我还积极践行九三学社中央“沪豫科技合作计划”和“九三学社院士导师培养计划”，先后赴河南科技大学和中原工学院，就沪豫高校交流与合作进行深入研讨，组织科技创新团队为河南省平顶山市化工产业集聚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平煤神马集团创新能力的提升献智出力，推动沪豫科技合作进一步深化。

毛泽东同志曾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又赋予了调查研究以新的时代意义，提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诚然，“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数十载的亲密友党，九三学社历来重视参政议政。在每年全国和上海市“两会”期间，围绕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热点，聚九三学社广大社员之智慧，我多次向国家和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建有用之言、献务实之策——先后向全国政协提交了《推进原材料工业智能制造，实现流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优化能源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加强行业特色大学建设，促进高校创新能力提升》《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推进依法办学》以及《关于优化专利转化制度环境，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提案》《关于重视炼油产能过剩，加快供给侧结构调整的提案》《关于改革人才发展机制，驱动科技创新的提案》等10项大会书面发言和近50份提案，履行了参政党的职能，受到国家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大部分建议被政府有关部门采纳，并在有关部门的工作中得到了体现。

我还担任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长期在高校负责行政管理、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工作，持续关注国内高校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实体经济，就一定要把制造业搞好，当前特别要抓好创新驱动，掌握和运用好关键技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大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培养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卓越工程科技人才既是高等教育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新时代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

要保障。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工程教育规模快速增长,工程教育质量稳步推进提升,工程专业认证体系逐步形成,基本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工程教育体系,2016年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国,充分表明了国际同行对我国工程教育的充分肯定。但我国工程教育依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工程科技人才培养还存在与新兴产业、新经济发展有所脱节等问题,需要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打破固有学科之间、校企之间的藩篱,促进学生跨学科综合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的提高。鉴于此,围绕高等工程教育培养工匠精神、打造大国工匠,近年来我在全国“两会”期间先后提出了《关于新时代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改革的提案》《关于加强工程科技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的提案》《关于优化高校工科教师结构,提升工程教育水平的提案》《关于构建本一硕连读模式,培养创新性工程人才的提案》《关于协同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提案》等一系列相关提案。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意味着经济的发展更需要高素质的工程科技人才。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通过改革工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培养机制,造就符合新时代和未来需求的工程科技人才,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输送更多的合格人才,这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义务。

工程科技人才是我们实现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工程教育是国家创新的重要引擎,未来社会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程科技创新能力,取决于工程科技人才这一创新主体的质量,可以说,工程教育的改革发展任重而道远。我将继续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持续推动。

### 同心同德 奋勇前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年距“五一口号”发布已整整70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个日益富强、民主、繁荣的中国,正在世界大家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70年来,九三学社和各民主党派一样历经发展,形成了共同的政治信念:“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多党合作的灿烂今天,就没有多党合作的累累硕果,更没有今日团结稳定、凝心聚力的政治局面和发展环境。”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增强责任和担当,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殷切希望。毋庸置疑,九三学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也将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当今世界,国际上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复杂多变、隐患重重,国内多元价值、多元利益、多元文化、多元思潮交融蔓延、碰撞冲击。此时此刻,更需要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进多党合作事业发展,这既是新时代九三学社社员最基本的政治坚守,也是每一个爱国者的自觉选择。

作为一名九三学社社员、科技工作者,就我所从事的石油化工行业而言,要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还有较长的一段路程要走。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发扬“钉钉子”精神,坚持不懈、求真务实、顽强拼搏、敢为人先,弘扬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协助党和政府把为人民造福的事情真正办好办实,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以背曰负,以肩曰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九三学社不仅是新型政党制度产生的见证者,也是多党合作事业的参与者,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决拥护者、践行者。展望前行路,不畏浮云遮望眼,我们将奋勇前行,为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贡献力量。■上海九三

(作者为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

## 春风化雨 远航未来

### ● 葛均波

今年是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70年来,贫穷落后的中国已经崛起为东方的一头雄狮,在科技、农业、文化、民生、经济各个领域成就卓著。与她风雨同行的九三学社也在祖国这幅蓝图上留下了恢弘的篇章。

作为九三学社的成员,我在社会各界和九三学社组织的关怀下成长,伴随着国家的富强崛起,见证着中国当代心脏病学的发展进步。

###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1977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吹响了改革的序曲。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犹如春雷一声震天响,各行各业的奋斗激情被点燃。

1979年,我进入青岛医学院学习。十年停滞使得同学们年龄差异很大,大家都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认真听课,刻苦学习,热烈讨论。1983年,国外专家在苏州开展了两例心血管介入治疗,中国的心血管介入治疗拉开帷幕。1985年,我已是山东医科大学二年级硕士研究生,开始学做右心导管,测量先天性心脏病病人的肺动

脉压力、分流量、肺循环阻力。

开放与改革齐头并进,中国打开国门,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以寻求先进的文化理念和科学技术。命运之神再次垂青了我,1990年初我被上海医科大学派往西德美因兹大学,开始学习冠心病的介入诊断和治疗,主要研究方向是血管内超声,赴德第一年在《德国心脏病杂志》上

发表了《腔内超声准确性及可行性研究》。1996年,我发现的可视冠脉激光成形术受到国际同行关注。

1997年一个平常的周末上午,我至今想来仍激动不已。在Essen大学医学院心内科实验室里,我阅读着病人的血管内超声图像,忽然间,发现一例心肌桥患者血管内超声图像上有一个低回声的半月形暗区,我立即找出所有心肌桥患者的血管内超声图像重新进行分析,发现图像都存在相似的“半月现象”,这个发现令我兴奋不已。冠状动脉本应走行于心肌表



2017年8月,葛均波获得“白求恩奖章”

面,但如果有一段在心肌内走行就成为“心肌桥”。“心肌桥”可导致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心肌梗死等,发病率很高,在中国人群的解剖检出率约60%,但常规检查方法很难对其诊断。我想,如果这紧邻血管壁存在的“半月形”无回声区域是心肌桥的血管内超声特征,那么“半月现象”就可以成为心肌桥高度敏感性和特异性的检查方法。

后来的研究证实了我最初的想法,“半月现象”使厚度在 $150\mu\text{m}$ 以上心肌桥的检出率接近100%,而冠脉造影的检出率约



葛均波在手术中

2.5%。研究过程中我提出了血管内超声判断冠状动脉易损斑块的定量指标,帮助早期识别可能发生破裂的易损斑块。我还发现心肌桥特异的多普勒血流——“指尖现象”,揭示了硝酸甘油加重心肌桥导致的心肌缺血,而 $\beta$ 受体阻滞却相反,改变了临床上心肌缺血均采用硝酸酯类治疗的做法。研究结果发表于 *Circulation* 和 *European Heart J*, 被 *N Engl J Med* (新英格兰医学周刊) 等国际一流杂志引用, *European Heart J* 杂志以“编者按”形式予以高度评价,称“Ge 为应用血管内超声检测心肌桥的先驱”“他的发现对判断临床症状非常重要”,并可“用来指导对该病的治疗”。此项成果还被编入国际经典心血管病教科书 *Brauwald's Heart Disease*。

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浪潮汹涌,举国上下,激情万丈,中华大地欣欣向荣、百花齐放。

###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同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列为今

后15年直至21世纪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国家在财力和政策上支持知识创新,加大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

1999年,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那一年,全世界约有200万患者接受了心血管介入治疗,中国仅占8000多例,而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心导管手术量不足千例。后来的发展却令人激动,在国家的支持下,在一大批专家学者的努力下,中国的心血管介入治疗事业飞速发展,以每年30%—50%的速度增长,介入治疗成为冠心病、心律失常、先天性心脏病的重要治疗手段。2015年,中国有超过56万冠心病患者接受冠脉介入治疗,超过11万心律失常患者接受经导管射频消融治疗,超过6万患者接受起搏器植入治疗。2016年,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有超过18000人接受心导管手术。

时间就是生命。及时快速疏通堵塞的冠状动脉,是降低心肌梗死患者死亡率的最有效方法。为使急

性心肌梗死患者能得到更快、更好的治疗,在院领导支持下,中山医院1999年设立了急性心肌梗死抢救“绿色通道”,开了华东地区第一条通过紧急介入手术抢救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之先河。这条通道24小时向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敞开,一旦有情况,三台呼吸机同时响起,患者即刻送至手术室,多名医护人员同时到位,施行紧急抢救,每年抢救近200例急性心肌梗死,成功率高达97%。

刚回国时,正是进口冠脉药物支架进入中国之初,一个支架要卖四万多。这些昂贵的药物洗脱支架多采用非降解材料涂层,植入后由于材料老化、慢性炎症导致晚期血栓形成而发生心肌梗死。为此,我组织建立了药物支架研发平台,和学生们成功研制出接枝肝素可降解材料涂层药物洗脱支架。该支架涂层材料可降解,降低了慢性炎症和血栓形成的风险,使致死性支架内血栓形成发生率由原来的1.2—1.9%降至0.34%,支架植入后双联抗血小板疗程由至少12个月缩减至6个月,而且定价远远低于国际同类产品,逼得进口支架纷纷降价,显著降低了医疗成本,每年为患者和国家节省超过10亿元医疗费用。我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 *Cardiovasc Res*, 这是我国在该领域得到国际认可的原创研究。2013年我们又成功研制出国内首例生物完全可降解支架“XinsorbTM”,并于2013年9月完成我国第一例自主

研发完全可降解支架植入术。

冠状动脉造影、心脏电生理检查、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埋藏式起搏器、SPECT与PET、腔内超声、先心封堵、射频消融术、ICD到CRT、药物支架到可降解支架、FFR、TAVR, MitraClip……一步一步,沐浴于改革开放的东风,得益于科教兴国的政策支持,中国心脏病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中国这条航船正在振兴发展的航程上稳稳地行驶着。同舟共济,风雨同行,我和九三学社广大成员一样始终秉持“爱国、民主、科学”的传统,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责,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奉献智慧和力量。

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作为医疗和科教工作者,我深知自己的社会责任,关注民生,关注热点,结合所长,认真调研,缜密思考,提交了数十篇提案,并在各种会议和场合呼吁大家关心这些涉及民生、教育和科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针对看病难看病贵的老大难问题,我撰写了《关于合理利用医疗资源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提案》,提出:在现有医疗总投入和医疗总规模的前提下,合理配置和利用医疗资源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同时需要政府介入,从政策和财政投入上向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社区倾斜,加快建立分级医疗服务体系,科学定位各级医院的功能。

针对中国心血管疾病呈“井喷”式增长,已经成为巨大公共卫生问题等现象,我提交了《设立“全国心梗救治日”》《完善胸痛救治机制》《大力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危险因素筛查与干预》《改进公共场所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AED)应用》等提案。这些提案及时得到落实,已经造福千千万万的患者。

对于社会上的一些热点问题和民生问题,我也将自己的所思所悟和意见建议撰写成提案,比如《关于加强监管食品中反式脂肪酸的提案》《关于培养青年人社会责任感的提案》《关于行政官员问责制科学化的提案》等等。

我深知一个人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学科的发展需要一批领路人,更需要所有参与者发挥自己的力量。2015年9月,我发起成立中国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旨在整合以产业为依托的国际化社会资源,致力于创新理念传播,建立“以医生为核心的协同创新创业生态圈”,打破心血管领域临床、产业、投资的界限,为产、学、研相关人士提供理想的交流平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2015年12月,我和同行们发起成立“中国心血管健康联盟”,以“学术交流、出版发行、培训认证、医疗拓展、创新产业、公众教育与筛查”为方向开展工作,开展教育培训和学术交流,把心血管疾病的最新诊疗规范和进展传递给基层医师,切实提高广大基层医院心血管病的诊疗水平。2016年7

月,我们发起成立中国胸痛中心总部,推动全国各地胸痛中心的信息化建设和认证工作,进一步提高我国急性心肌梗死整体救治水平。我的辛勤工作,社会和九三学社组织给了我许多荣誉:201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2012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6年11月被九三学社中央授予“九三楷模”荣誉称号,2017年8月获“白求恩奖章”,2018年8月获“十一届中国医师奖”等。

作为心血管疾病诊疗方面的医务工作者,平时我将很多精力用于自己的专业,对于专业以外的政治理论知识,虽然知晓一些,但仍不足。近年来,我加大政治理论学习力度,充实社会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领导艺术与方法。

2009年我参加了由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市委党校和市社会主义学院共同主办的党外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经过40多天的全脱产学习,系统深入地学习了党的基本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参与课题研讨,还结合实际学习了当前经济形势及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

我还担任九三学社复旦大学委员会的主委,参与学校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基层组织活动和有关研讨会等,就学校发展形势、办学体制改革、教育创新、师资培训、科研成果评价等问题开展讨论,为学校的发展献言献策。

##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一带一路”，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杭州 G20 峰会，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南水北调，史无前例；西藏天路，世界屋脊上的巨龙。中国天眼、神舟飞船、北斗卫星、辽宁航母、中华神盾、北京奥运……中国正以大国姿态展示于世界。

国家的发展势如破竹、日新月异，作为一名“九三人”，我要感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祖国给我们带来的好光景和好时机。“九三人”一定要坚持好、完善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地履行参政党职责，加强参政党建设。“九三人”要充分发挥科技和教育人才优势，在教育、科技等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疾病谱已悄然发生了变化。目前，心血管病死亡占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的首位，高于肿瘤和其他疾病。心血管病目前患病人数达 2.9 亿，其中高血压 2.7 亿、冠心病 1100 万，心力衰竭 450 万。心脑血管疾病成为了威胁中国人健康的主要杀手。如何更好地预防和治疗，如何提高心血管病患者的生存质量，如何做到身与心的平衡，这些都给心血管病医生提出了挑战。我愿为祖国的心血管病学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奋斗终生。■上海九三

（作者为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



## 一座桥与一个统战老兵

● 袁芸东

过去每年的清明节，我爷爷的邻居王老总会前往位于新河的崇明烈士陵园和崇明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祭拜一下他当年的战友。王老，一个参加过崇明人民抗日战争的人，一个建国后默默在农村统战战线上接着“战斗”的老兵。小时候，作为邻居的我，听他讲述过太多这样那样的故事，也伴随着自己的成长见证他在农村统战战线上这样那样的经历。而这些故事，见证了建国到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村的变化，以及农村统战工作的变化。那些故事中，一座简单的农村小桥是王老故事的最好“代表”。

王老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崇明本地某乡的副乡长，由于其

在崇明抗日战争时期负责抗战连队的保密和人事工作，建国后他负责该乡的农村统战工作。时间久了，王老发现乡民们向东进城并不十分方便。原因很简单，乡里的东面有一条说宽不宽说长不长的河，乡民们进城必须绕过这条小河而这样往往得多走半小时左右的路程。

王老心里一直觉得为乡民重新造一座桥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可自己毕竟只是负责统战工作，造桥这样一个项目别说是乡长，就是镇里也得往上请示，这一来二去的，就算是批准了也不知道要多久，乡民们的出行难问题也只得这么拖着。“统战工作就是把心

往一处使,给老百姓谋福利,”这是王老评价自己工作的一句话。为了这样一座桥,王老乡里、镇里不知道走过多少回,甚至徒步走到过县城里好几次。那时候,村民一是敬仰王老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二是奇怪王老为什么对造这样一座桥如此执着。最终,王老关于这座桥的提案被县政府采纳,造桥也摆上了议事日程。

“要造就造个好的,”造桥虽然批准下来了,但王老想为乡里造一座更好的桥。他继续四处奔波,发挥自己在统战线上的资源,为桥募集资源,最终建成了当时为数不多可以直接与公路连接通车的乡村桥梁。王老住的地方是东风农场第14生产队,这桥也就被叫做14队桥。

拿王老的一句话说,做这一切就是“当年为了抗战把它拆了,如今就要还百姓一座更好的。”后来,每逢有外区县人员来村里调研,后继工作人员都会带他们到这座桥上去看看、讲一讲王老和这座桥的故事。

时间飞快地流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农村的生活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座桥也见证了人们出行从行色匆匆到车轮滚滚,而王老也到了临近退休的年纪。多年来他扎根农村,背靠统战工作的大旗四处调研走访,通过一次次提案、一封封社情民意为农村的百姓带来了生活的便利。而事情往往也就是这样巧,在

王老临近退休的前夕,他所在的村被列入拆迁的名单。

这也许是王老退休前最后一次“艰巨”的统战工作,在镇党委的带领下,王老挨家挨户地做村民的安抚工作,偶然有言辞或是行为过激的村民,王老也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地进行劝说。不仅这样,王老还带头在补偿协议上签了字。可唯独当拆迁规划里那座桥也赫然在列的时候,王老的面色一下沉重起来。这桥落成这么多年,王老对于桥的维护总是亲历亲为,若是发现安全隐患,也是第一时间上报处理。附近的人都说,有了王老在,桥上从未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

可如今桥就要拆了,王老心中有种失落感。他想起了当年为了抵御日本人,他和战友们在桥上奋勇抗争并最终选择了炸桥。他也想起了当年为造桥四处奔波的辛苦和桥建成后给村民带来的方便。想到这,他突然看到了办公桌上一枚小巧的纪念章,麦穗和齿轮围成了一个圆形,象征着工农大众的共和国基石;红星高照、几面红旗迎风飘扬,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如同雄鸡高唱的祖国版图,矗立在东方;“1949”年的金色数字十分醒目,最下方红色绶带镌刻着繁体的中文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王老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一名参加过抗战的老兵,更是一名在统战线上工作几十年的老兵,心理纵

有千般不舍、万般回忆,但一切都应该以统战为重、大局为重,更应该以老百姓的利益为重。

村民到如今还记得,桥拆除的那天,王老一个人在雨中撑着伞远远地看了良久。

退休后的王老也没有闲着,时常在农村田间走着,听听农村需要什么、老百姓需要什么,把这些需求写成社情民意交给新的继任者。王老的那座桥被拆了,而如今农村的桥,都做到了可以通车的标准。

最后一次见到王老的时候,他在病床上写社情民意。拿他的一句话就是,“这么多年了,早就写习惯了,如果哪天不写了,就会全身不舒服”。王老虽然退休多年,可乡里乡亲有啥困难、有什么提议,都会第一时间与他交流,他也四处走动,关心百姓生活、收集资料,撰写社情民意向政协等部门反映。

时常,我在想,那一座桥虽然拆除了,可那一份份社情民意,那颗为百姓的心就是连接王老和百姓的桥,也是统战工作的桥。“只要有一份被采纳,只要能为百姓谋一份力,就是我们统战工作的胜利。”这是王老对于我这个“新兵”的教诲。

有一句话说:“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让我说,老兵的精神永远在,我们会一代代不断地传承。上海九三

(本文作者为崇明区教育局干部)



## 我与“上汽大众”的不解之缘

● 项 玮

弹指一挥间。1978年中国重新开放门户至今,40年光阴如白驹过隙。

这40年间,我借着开放的东风,在父辈和同辈人欣慰羡慕的目光下,走进大学堂,步入各种国际性展览会、技术交流会,触摸先进科技、学习先进理念。尤其是三进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就了我个人一段主要的人生经历。

倘若说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如微露的晨曦熏染着中国大地,给中国现代汽车工业带来希望的曙光,那么,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成立,则似蓬勃的旭日,让中国汽车工业快速发展,如日中天。

而我,则机缘巧合,两进两出,

第三次终于决定扎根于可谓是现代汽车工业的起源地——安亭,并在此度过我人生最主要的职业生涯,同时见证了我国现代汽车工业的成长和走向成熟。

1985年大学毕业前夕,听说上海成立了一家中德合资企业,我这个当初就被“德国制造”所代表的先进技术吸引而选择德语作为专业的学生,跃跃欲试。犹记得彼时负责工作分配的那位青年老师,力劝我别去远郊那个生死未卜的新企业。结果,我被分入当时沪上赫赫有名的万人国企,与“上海大众”擦肩而过。

然而,冥冥之中,我与“上海大众”的缘分并未就此断绝。因为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大众”亟

需称职的翻译人员,工作才半年,我就被选中借调到这个百废待兴的企业。

那一借,便是一年多。如果不是我还想去外面的世界多看看,就差点留在安亭。那一借,每天大量的新概念、新信息扑面而来,让没有多少专业知识积累的我能够在这个知识爆炸的阶段如海绵吸水,孜孜汲取,终生难忘。那一借,让刚跨出校门对经济与技术一窍不通的我,看到了计划经济制度下国企管理和德式管理理念的尖锐冲突,学到了当时中国社会上闻所未闻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耳听各种管理新名词,目睹德国人追求完美的严谨工作态度。大量技术、工艺和管理方面的术语及概念,经由我的笔

端、通过我的口述，传授给这个新生企业的员工。

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也是翻译过程中的创新，因为当时很多内容完全没有相对应的中文说法。记忆犹新的是，借调过去不久，公司产品开发部门一位精瘦的德国专家，说话像机关枪，约定夏日午后的时间，给我所在部门的中方人员培训所谓“技术更改”整套流程。在那个容易犯困的时段，面对枯燥而又完全陌生的技术术语和内容，在德国“机关枪”的不断扫射下，我体内迸发出不服输的倔劲，沉着应战，顺利完成两个多小时的培训翻译。事后，那把全公司有名的“机关枪”，不仅没看成我的笑话，反而被我这个“初中生”所折服，并由此引出一段佳话。也正是由于“上海大众”创业阶段的各种艰辛和各种场合的锻炼，加上自身的勤勉和细心，我快速适应了完全陌生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在翻译领域里迅速成长，得心应手，并受益终生。

后来，由于我想通过夜读为自己的大脑继续充电便谢绝了当年交通还不怎么方便的“上海大众”抛来的橄榄枝。但与“上海大众”的缘分却依旧延续着。此后三年，我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借调至“上海大众”，并最终在第三次缘定“大众”、落户安亭。那时已经是1991年初了。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经年的努力换来的是：在专业上，我从当年生涩的德国语言文学专业毕业

的新手，成长为如今涉足科技和社会文化艺术领域综合性的翻译人员。本世纪初，我提前实现了年轻时设立的专业目标——获得翻译职业最高职称——译审，并荣幸成为以爱国、民主、科学为宗旨的科技界知识精英聚集的组织——九三学社的一员。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上汽大众”的产量也从1985年的2000辆到2017年的200万辆，市场份额仍居全国第一。2017年，公司成立第32年之际，第1700万辆轿车下线。“上汽大众”还多年荣获“全国最佳雇主”的称号。

这一过程，我几乎从始至终有幸参与。前几年公司接踵而至的异地扩建项目中，我亲历选址、落地谈判和规划建设过程，目睹一座座异地新工厂拔地而起。

如今，更名后的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看准全球汽车发展方向，加紧研发并同步规划新能源汽车和相应的制造基地，底气十足地向着未来迈进。而我，则受年龄限制，即将退出这一行业。赋闲之前，我看到不少汽车行业的新青年骨干，充实到我们“九三”的队伍中来。看着周围那这些年轻的同事，回想当年意气风发的我，除了感慨，更多的是欣慰：青出于蓝，更胜于蓝。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月28日，来自大众集团全球各品牌的规划领导聚集沪上。从抵达到离去短短两天半中，他们看到了上海的高楼林立和繁华，考察了“上

汽大众”各个工厂的生产现状，试驾了国内现有的各款新能源车。从下飞机体验代表着“上海速度”的磁悬浮列车，到会中经36公里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去参观宁波工厂，直至会议结束后登顶上海中心119层俯瞰夕阳下、夜幕彩灯映照中的魔都体会上海的发展高度，这一切，无一不让他们叹为观止，心生折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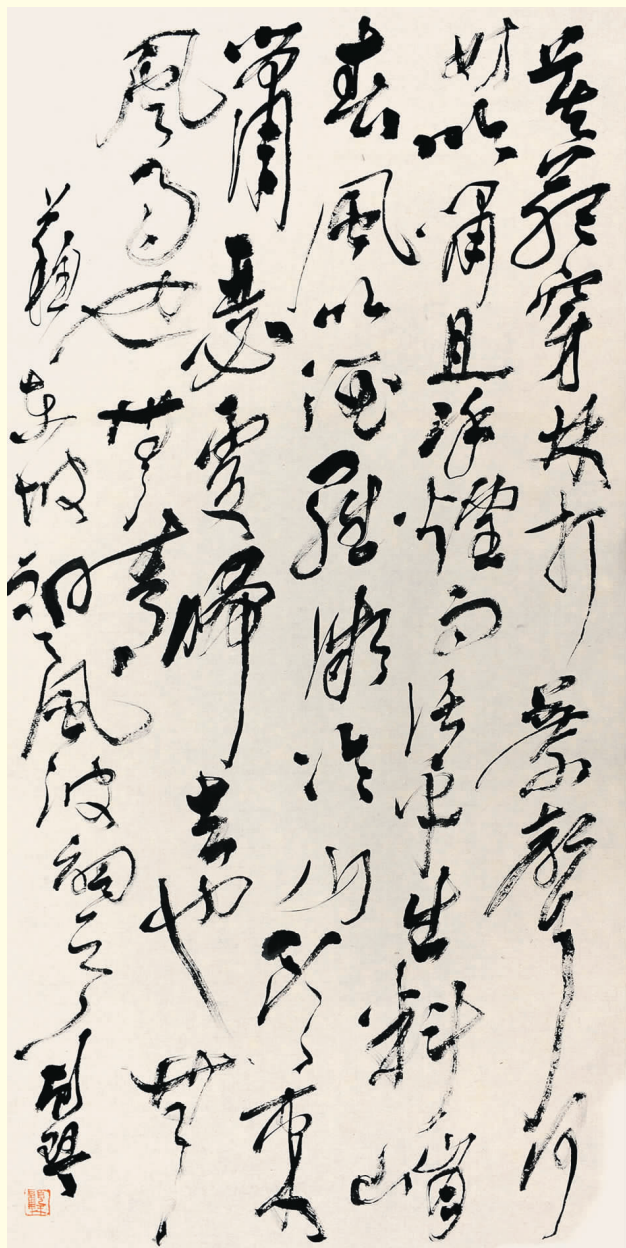
“百闻不如一见”，这也是让汽车行业的规划领导前来体会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初衷。全程陪同的我一直在感受他们的赞叹，感受他们的激动，感受他们的欣赏，这与40年前我们感叹西方世界的先进截然相反。作为一名整个职业生涯结缘汽车工业的中国人，我何其自豪！

2018年，还是“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5月5日，九三学社读书会成员自发组织了一次浦西滨江20km徒步活动，北起杨浦大桥、南抵徐汇滨江绿地。天公作美。在适宜的气温下，53位笃信“爱国、民主、科学”的同道中人沿着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西岸一路向前。一路上不时有人发出惊叹；而我，则在阵阵花香飘拂中静静感受这片故土的巨变，用手中的镜头捕捉浦江过往的历史、如今的脉动。

老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在中国，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奇迹一直在发生。■上海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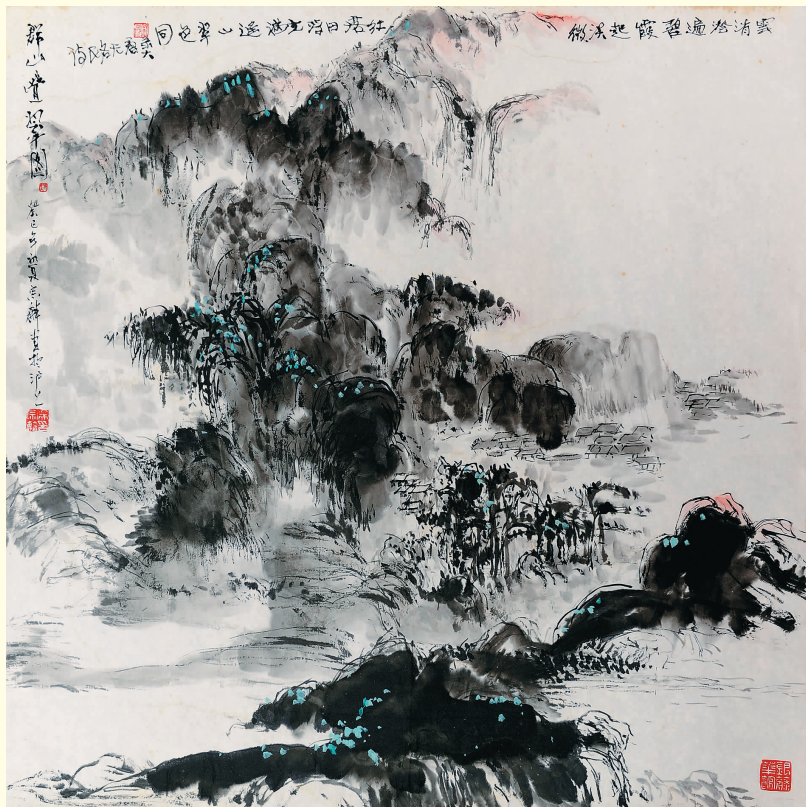
（作者为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译审）

# 书画作品选登



顾琴书 苏轼《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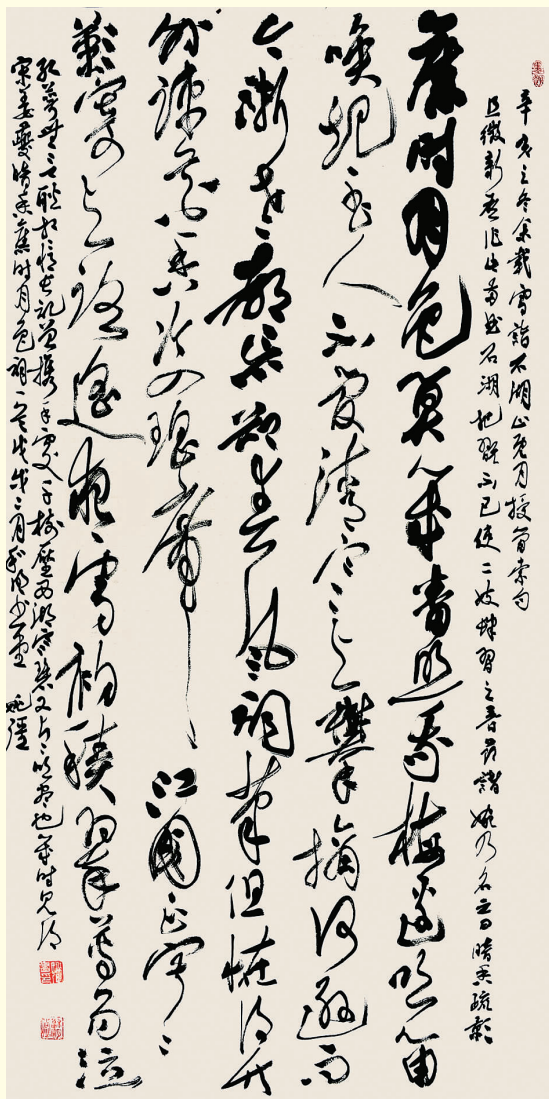
吴宗麟画 无名氏《空水共澄鲜》

悠然四望通，渺渺水无穷。海鹤飞天际，烟林出镜中。云消澄碧，霞起澹微红。落日浮光满，遥山翠色同。樵声喧竹坞，棹唱入莲丛。远客舟中兴，烦襟暂一空。



时牛勤篆刻 祖国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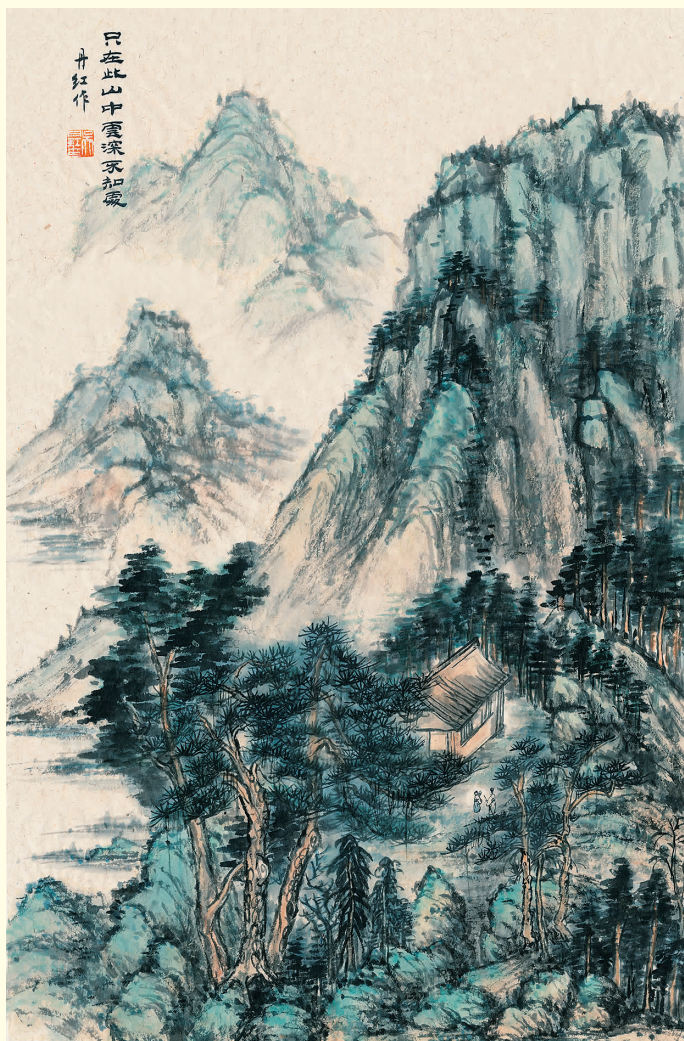
# 书画作品选登



姚强书 姜夔《暗香》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吴丹红画 贾岛《寻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黄昏后

欧阳修《生查子·元夕》句：人约



柳梢头

欧阳修《生查子·元夕》句：月上

孙君辉 篆刻

紅軍不怕遠征難  
 萬水千山只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  
 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  
 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軍過後盡開顏

毛澤東七律《長征》一首  
 蔡劍明書於己丑年冬月

蔡劍明書 毛澤東《長征》

蟬鳴空桑林，八月蕭關道。  
 出塞入塞寒，處處黃蘆草。  
 從來幽并客，皆共塵沙老。  
 莫學遊俠兒，矜夸紫騮好。

王昌齡塞下曲四首之一  
 阮長青書

阮長青書 王昌齡《塞下曲》

四首之一：蟬鳴空桑林，八月蕭關道。出塞入塞寒，處處黃蘆草。從來幽并客，皆共塵沙老。莫學遊俠兒，矜夸紫騮好。



波紋碧皺。曲水清明後。折得疏梅香滿袖。暗喜春紅依旧。歸來紫陌東頭。金釵換酒消愁。柳影深深細路，花梢小小層樓。

郭牧 画

晏几道《清平乐·波紋碧皺》

波紋碧皺。曲水清明後。折得疏梅香滿袖。暗喜春紅依旧。歸來紫陌東頭。金釵換酒消愁。柳影深深細路，花梢小小層樓。



王继青 画 柳永《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时牛勤 篆刻 长风破浪会有时



柴宇 画 唐彦谦《莲》

新莲映多浦，迢递绿塘东。静影摇波日，寒香映水风。金尘飘落蕊，玉露洗残红。看著馀芳少，无人问的中。

## 为国家采矿安全能源建设出谋划策

● 口述:吴价城 整理:王正方

我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是一名长期从事工程地质研究、矿山资源开发建设的老“九三人”。我是在父母、兄弟姐妹都是中共党员的家庭环境里长大;但我崇尚民主与科学精神,坚信只有科学才能救国、强国。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后,我一直从事矿山工程建设工作,一生与工程地质结下不解之缘。

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国家能源建设迅猛发展。我在上世纪80年代参加了国家渤海湾畔莱州金矿顶水开采和防水设计研究、江西赛城湖畔的铜矿开采防水研究等重大项目;90年代,我又参与了很多国家重大建设工程项目的地质条件研究与实践。现在想来,能看到祖国日益繁荣强大,国家矿山生产、能源建设蒸蒸日上,不枉此生。

2010年,国内先后发生了山西王家岭煤矿、黑龙江七台河隆鹏煤矿等矿山突水淹井事故,生命财产损失惨重,社会影响巨大。作为一名参加过国内数十项矿山开采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研究和矿山水的防治工作,且长期从事岩土工程、水文地质勘察与环境地质评

价的工程师来说,听到矿山事故触动很大,觉得应该为中国矿山安全生产出点力、做点贡献。

为此,我认真思考分析了国家的矿山生产管理现状和诸多事故发生因素,研究了现有矿山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设计规范标准等文件,结合自己专业实践经验,发现一些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亟需从顶层设计上加以完善。于是,我建议国家尽快对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和设计规范标准进行修订补充,凡是存在突水、瓦斯爆炸、有害气体及放射性污染的井下开采矿山均纳入管理范围;梳理提出了7条建议,包括应将安全生产列入矿山设计范围,作为初步设计审查的重要内容;矿区资源勘探报告应有矿山开拓、开采安全隐患的评估章节;矿山开拓之前应建立矿山开采地质模型;开采前通过钻探、地面物探等多种方法查明矿山开采范围老窖及采空区的体积、开采巷道与充水老窖地板的安全距离,查明老窖及采空区内的充水状况并论证其充水储量;监理完整的老窖水、地表水及含水层地下水观测系统,设专人水位观测和预报;矿

山排水系统设计要有防止突水的专门设计和排水设施的安全预留,并定期检修保持设备完好;矿山开拓掘进中把超前探水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并把探水情况编入班报中;对存在顶水开采的,应采用钻孔或其他方式提前梳干老窖或采空区的充水,做到预防为主等。

这些针对矿山安全设计、生产管理的建议,从血的教训中深刻分析了各类事故的原因,指出了现有国家矿山安全生产全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在矿山初步设计内容、开采地质模型、开拓开采前的钻探、地面物探、建立地下水观测系统、开拓掘进中的超前探水以及顶水开拓时预防要求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解答,为后续更好、更安全地进行矿山设计、生产提供了技术保障。这些建议最终被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采纳,在《矿山资源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中加以明确。

能源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现代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根据上海的城市定位和发展方向,能源建设更关乎国家战略发展。以上海为终端的西气东输工程自2000年开工建设、2004年一期

建成投产；东海平湖油气田的南汇天然气处理厂一、二期均于2004年建成投产，大量天然气进入上海。但是，天然气类似于电，难以储存，产用必须平衡；且我国的天然气丰度低，西气东输成本偏高，再加上当时对天然气的利用刚刚起步，多种因素制约了天然气的加速利用。能否在终端高效利用天然气，并加快天然气市场的开拓，已成为能否快速发展天然气和调整能源结构的关键。

随着经济的发展，2005年前后，全国大城市普遍存在用电紧张现象，上海也时常发生供电紧张的情况，这成为制约地区生产生活的一大隐患。对此，我调查了上海各地区的用电状况，并结合天然气利用现状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用分布式能源系统(站)建设来有效缓解上海供电紧张问题的设想。这个设想的依据源于分

布式能源系统(站)的一个主要特点，即发电在区域内直供，联网但不上网销售，依靠大电网的巨大容量保证供电负荷、电压与效率的稳定和作为事故备用电源。相对于大电网，分布式能源站不仅减少其供电负担，而且也减少用电制冷空调、加热热水的负荷；而且分布式能源站中的天然气可以近100%效率发电，比在联合循环电厂发电提高整整一倍的效率，可以大大节省网电。

为此，我提出建议，在上海选择建设上百万KW的分布式能源系统来代替同等规模的电厂和电网，并明确指出分布式能源系统为能源利用、经济建设带来的6大好处。

一是节约一部分高压电网和变电站建设费用；二是节省上百万KW电力上网的运输损耗和调度费用，从而降低输配电成本；三是以冷热电联产形式高效利用大量天

然气，可达到能源结构调整而具有更大社会效益；四是分布式能源站比大型发电厂投资少、效益高、建设快、投产使用快；五是分布式能源系统以大电网为后备补充，用电可靠性高，电网负担减少，供电安全性提高；六是可带动燃气轮机、余热锅炉、大型制冷机等制造业的发展，促使社会GDP提高。

除了提出建设分布式能源站的优点，我还对如何布局建设提出了3条建议。最终，这些建议上报市政府，得到市政府领导的认可，由市发改委专题安排听取汇报工作，并进行研究。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一个九三人，能够亲历我国改革发展的历程，目睹人民生活安居乐业，我感到欣慰和自豪。 上海九三

(吴价城为上海能源化工总公司原教授级高工，王正方为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审计师)





## 春风秋雨过李庄

● 罗琳

转眼,改革开放四十年。祖国大地在改革的春风中苏醒,如今恰是累累果实的收获季节。近来,常常想起一个匆匆路过的低调古镇——李庄。

2015年10月,九三社中央为响应“一带一路”的号召,组织去云南采风,和当地九三学社开展学习交流。我荣幸地作为上海代表参加。同行的除了各省市在文化、学习、宣传等方面比较活跃的社员,还有湖北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方方。一贯快人快语文章犀利的方方既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民主党派

成员,并且坦言还是第一次接触到九三学社。为了提高社员的文学水平,社中央特意请方方做写作讲座,谈谈写作方法与体会,并让社员充分互动。通过交流与碰撞,大家都受益匪浅。九三学社求真务实、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也给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我们沿采风的行程一路去了昭通的五尺道、盐津、水富县等地。

大雾迷离的金沙江下游,便是长江,两天后我们到了四川宜宾境内。和宜宾九三学社的社员学习交流后,方方突然想起了心仪已久的

李庄,建议我们一起去看看,马上得到了一致响应。车行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再下游南溪李庄,一个长江边的千年古镇。宜宾是长江第一站,李庄是第三站,依长江繁衍生息,形成了“江导岷山,流通楚泽,峰排桂岭,秀流仙源”的自然景观,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古镇”之称。这是一个诉说着抗战风云和沧桑、沉淀着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古老而低调的小镇,在淅淅沥沥的秋雨中,默默而倔强地折射着中华民族精神。

李庄古为渔村,汉代曾设驿站,为明清水运商贸之地。文物古



为纪念馆的国立博物院旧址,大量珍贵图片前,我们思绪纷飞,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而这里却是一方读书、求学、做学问的净土,很多知识分子坚守着他们的爱国情怀和铮铮傲骨。

雨时大时小,巷子里开开合合的伞,却也拥挤。古镇是低调的,但像我们这样的人们自会寻去。思绪悠长、精神饱满,虽行色匆匆、淋得狼狈,我们却看到了民族的脊梁,坚定了前行的方向。江边的落叶在秋雨中清新,梁思成黑黑的雕像严肃而干净,仿佛彰显着知识分子的良知。栗峰山庄大门有一联,提到李庄民俗民风“宗风两铭”。“两铭”即宋代张载的《东铭》和《西铭》。张载有名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李庄当时接纳文化人,不仅是“为往圣继绝学”,而且也是为发展学术、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在新的时代,传承和发展宋代道学精华并赋予了新的意义。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主委赵雯,在给社员讲国学时,就多次要求大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传承优良文化,担当起时代赋予的责任。

改革开放中,李庄在传承、在发展。她向人们展示着过往的英勇,更展示着沧海桑田的巨变。意外经过的李庄,就这样牢牢地在我心里驻扎下来。■上海九三

(作者为松江燃气公司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迹众多,人文景观荟萃。古建筑群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木雕石刻做工精细,栩栩如生,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明、清时期川南民居、庙宇、殿堂等建筑的特点,现仍保存明、清古镇的格局和风貌。临江码头,有石板阶梯层层叠叠而上,两旁风火山墙高耸,雕花门窗林立,院落间有幽深的小巷。李庄更有被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赞为“梁柱结构之优,颇足傲于当世之作”的“旋螺殿”,与“魁星阁”、“百鹤窗”、“九龙碑”一起堪称古镇四绝。李庄的建筑艺术让我们陶醉,而李庄在抗战时期勇敢智慧的民族精神,更是深深震撼了我们。

李庄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1939年,自“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十六字电文发出起,国立同济大学、金陵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十多家高等学府和科研院所,在整个抗战时

期迁驻李庄。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如李济、傅斯年、陶孟和、吴定良、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梁思永、劳干等云集李庄达六年之久,在这里潜心科研和培育人才。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这部扛鼎之作就诞生在李庄。这对李庄的社会、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李庄更是因为抗战时期文化中心而闻名遐迩,成为当时中国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重镇。当时人口不到一万的李庄,勇敢地保护、养活了很多大学与学者,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李庄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涵养地,传统文化的折射点”。李庄的民俗民风,历来就是淳朴好客、重视耕读、热心公益事业,心怀天下、爱乡爱国、海纳百川。接纳这些重要机构和著名学者,就是传承和发展了这种民俗民风。彼时,故宫博物院的数千箱珍贵文物历经艰辛转运来李庄,就放置在清道光十九年购建的张家祠堂内保存。在现今作

他是作家,创作了大量杂文,短小精悍,针砭时弊,其辞锋之犀利、讽刺之辛辣、识见之广博,在当时文坛堪称翘楚;

他更是学者,直言自己“一生所在,唯此两书”——《诗经直解》《楚辞直解》,两部力作凝聚了毕生心血,学界誉之“诗骚直解堪千古”;

他就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展先生。

今年恰值陈子展先生诞辰 120 周年,我们刊发此文,缅怀这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杰出学人。



## “不苟同,不苟异,不溢美,不溢恶”

——回忆陈子展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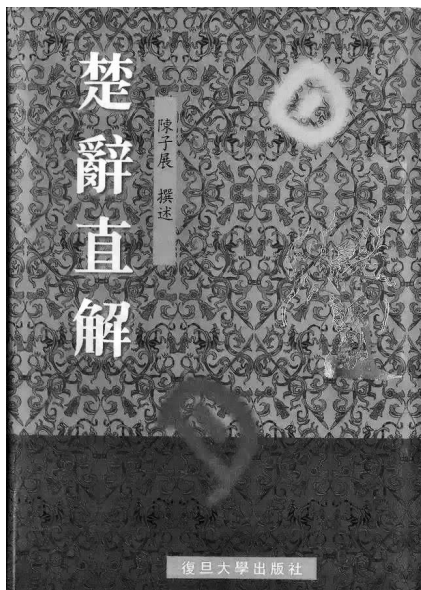
● 徐志嘯(特邀)

### 集“鲁迅风”与“知堂体” 于一身的杂文家

陈先生早年因生活所迫,大部分时间从事杂文写作,借此获取稿费卖文为生,这使他创作了大量的

杂文,以及短论和诗歌作品,其中尤以杂文驰名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文坛。先生的杂文大多短小精悍、泼辣尖锐、刺中时弊,其辞锋之犀利、讽刺之辛辣、识见之广博,在当时文坛堪称翘楚。

陈先生的杂文主要以两种风格行世,其一为“鲁迅风”,内容常涉世事,文笔犀利,充满调侃和讽刺,酷似鲁迅的杂文风格,是投向当时社会的匕首与投枪;其二为“知堂体”,类同知堂文风,草木虫



鱼、乡土风俗、歌诗土语，随手拈来，涉笔成趣，显示了他的渊博学识与幽默文风。

这些杂文发表时，多以楚狂、楚狂老人、湖南牛、大牛等笔名行世，读者可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陈望道主编的《太白》、谢六逸主编的《立报·言林》、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曹聚仁等主编的《芒种》等报刊上见到。陈先生也由此成为 20 世纪 30 年代文坛上著名的杂文名家。

### 领风气之先的近代文学研究者

陈先生是我国现代最早重视近代文学研究，并于 20 世纪初问世近代文学史著作的少数学者之一。他的两部近代文学研究著作《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问世后，广受好评。学界人士只要提到近代文学研究，必定讲到这两部开山之作。

在陈先生这两部书问世之前，胡适已发表了《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陈先生没有人云亦云地照搬胡适所言，而是别创一说，且对胡适论著中有所忽视的近代时期出现的旧体诗词创作及其作者群——宋诗运动、同光体代表诗人、近代四大词人等，作了专门论述，体现了他的独家风格。

陈先生的两部近代文学研究著作，刚一问世旋即获得好评。赵景深先生评价：“这本书是我极爱读的。坊间有许多文学史的著作，大都是把别人的议论掇拾成篇，毫无生发，而造句行文，又多枯燥。本书则有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并且时带诙谐。书中文笔流畅，条理清楚，对文学大势说得非常清楚，读之令人不忍释手。”唐弢先生在谈到《申报·自由谈》时，特别提到了这两部近代文学专著，称陈子展先生是近代文学的研究专家。

### “一生所在，唯此两书”

陈先生这一生，除了教学工作（从中等师范教师到大学教授），为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奉献了几乎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早年的杂文创作，使他驰名文坛；中年的近代文学研究，让他赢得了学界美誉；中晚年的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诗经》《楚辞》研究，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并因此驰誉海内外。

陈先生毕生用力最多、体现功力最深、成就最大的，首先是

《诗经》研究，其次是晚年的《楚辞》研究。

陈先生的《楚辞》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那时他已年逾花甲，一千多年来蒙在楚辞研究领域的层层迷雾，促使他下决心要作一番爬梳剔抉的工作，努力还世人一个近真的《楚辞》原本面目。

为此，他翻遍了历代的《楚辞》注本，认真系统地研读了马、恩和西方许多理论家关于人类历史及社会发展的论著，参考了大量的上古时代历史、文化、风俗、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等出土文物资料和历代文献，其目的在于还屈原与《楚辞》的历史真面目，同时对历来的楚辞研究诸说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他阐发了属于个人的独立研究和独到见解，其治学特点真正体现了自己所奉行的宗旨：不苟同，不苟异，不溢美，不溢恶，实事求是。





本文作者徐志啸与陈子展先生(右)在一起

是,无征不信。

陈先生在阐释屈原及其作品的过程中,特别提倡历史唯物主义。他指出,我们研究古典文学,必须以客观现实、时代思潮、历史背景,以及作者个人的特殊条件,作为创作源泉的反映论,才能对其作出相应的客观评价,如只是从作者的主观情趣和灵感、个人想象和幻想、无目的的抒写和纯审美的渲染角度看问题、作阐释或解说,就会难以说通,也就难以令人信服。这充分体现了陈先生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研究立场和态度。

可以说,集楚辞全部作品注、释、笺、译、论之大成的《楚辞直解》一书,确立了陈先生在现代楚辞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他自然被聘为了中国屈原学会的学术顾问,并被列为二十世纪楚辞研究八大家之一。

陈先生对自己对《诗经》研究风格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读遍世

上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决不妄下结论。他的这种有目的的广泛阅读,为他正式着手研究《诗经》打下了厚实基础,而他沙里淘金的治学态度,使其研究结论更能逼近文本的客观实际,更符合历史和社会的真实。

陈先生态度十分明确,不唯古人所说是从,不做“毛(毛亨、毛萇)郑(玄)佞臣”“三家媚子”“朱子信徒”,也不对古人成说一概否定、全盘抛弃,而是一切从客观事实出发,是即是,非即非,明确弃取,毫不含糊,关键看是否合乎诗旨本义。

陈先生的《诗经直解》,有着独特的体式:原诗与译诗上下并列,便于对照阅读;译文力求正确、畅达,努力保存原始风味与民间习气,不苛求再创造;注释汇集前人成说,兼采近人新见,博观约取;解题(“今按”)尽力切近诗本义,扼要评述“诗序”与反“诗序”



诸说;“韵部说明”方便读者了解诗韵。

他曾说,自己“一生所在,唯此两书”——《诗经直解》《楚辞直解》,两部《直解》可谓他毕生学术研究成果的结晶。

(本文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4月9日《陈子展:傲骨见精神 文章百世名》)

陈子展,湖南长沙人。原名炳坤,笔名楚狂。东南大学教育系肄业。曾任南国艺术学院、中国公学、沪江大学教授,上世纪50年代后任复旦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著有《诗经直解》《楚辞直解》《唐宋文学史》《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讲话》等。1990年4月8日因病去世,终年92岁。生前曾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经学会顾问、中国屈原学会顾问、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 中国有自己的麻疹疫苗，因为有他

● 詹耘 季萍 李培勇

62年前，是他提出了《研究并制造预防麻疹的减毒活疫苗》的议案，也是他带领团队开始了国产麻疹疫苗的研制工作，他还是中国第一位细菌学博士、世界上研制抗伤寒血清的先驱者之一。他就是余灃。

余灃（1903—1988）幼年时天资聪颖，读过两年私塾，而后才正式进入学堂念小学。在小学时，只读过三年书的他考上了北京高师附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前身）。在中学时期，他勤奋好学，聪明过人，学习成绩连年优秀。1919年，时年16岁的他经历了“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当时他与挚友叶衍庆一起，加入了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而“尽早成才，为国奉献”的理念，也成为他们当年所追求的梦想。后来，他不顾学校校长的反对，还未毕业就以优异成绩直接考取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医学院的前身），由此开始了他无比热爱并愿为之奉献一生的医学事业。

### 中国第一位细菌学博士

1927年，在学校导师的推荐下，余灃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继续进修细菌学，并师从当时世界著名的细菌学和免疫学家秦思尔（Hans Zinsser），这个宝贵的机会令他兴奋不已。一个崭新的职业生涯正等着他。

在秦思尔科学民主精神的影响下，余灃在专业学习和病理研究上思路更加开阔。当时，他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一种细菌——白喉杆菌的研究上。白喉传染病患者虽然经过抗毒素治疗后多数咽喉部的白膜会消失，但总有少数患者仍长期在鼻咽部带菌，虽然对原患者不再致病，但对他人仍是一种传染源，而治疗白喉的抗毒素不能使有毒的白喉变为无毒型。

如何使有毒变为无毒？这引起了余灃的强烈兴趣，他决定揭开其中的秘密。经反复思考，余灃大胆假设：



余澹(左)

“要消灭白喉菌,可能需要抗菌物质。”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秦思尔,这位老教授对于当年才 20 多岁的青年的创造性思维惊喜异常,表示愿全力支持这位学生独立开展这项研究。同时,在秦思尔的建议下,余澹延长了在美国求学和科研的时间。

在白喉变异性的研究中,余澹发现把白喉杆菌培养在含有抗毒素的培养基中,细菌并不会发生变异;而培养在含抗白喉菌的血清中,菌体则会由光滑型(有毒)转化为粗糙型(无毒或少毒)。他的实验证明,只有用抗白喉杆菌的血清才能消除细菌的致病性,而这可通过注射白喉菌苗来实现。这一发现不仅在理论上鉴别了抗菌与抗毒的不同功能,而且能马上用于临床,解决实际问题。

当时,秦思尔教授已意识到了这一研究的科学价值,他建议余澹用这一研究成果来申请学位。其实在此之前,余澹早已抓紧一切时间通过了全部的博士必修课程。他凭借论文《白喉杆菌抗菌免疫和抗毒免疫不同质研究》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细菌学专业博士学位,也成为当时中国第一位细菌学博士。

1930 年,这篇论文发表在《美国细菌学杂志》,秦思尔、摩尔通、海德里等细菌学专家都证实了这一研究的现实价值。1937 年,上海仁济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的前身)一些护士不慎感染了白喉杆菌。在对已治愈的 6 名带菌者进行了 4 到 5 次菌苗注射后,病原菌即被消灭。这再次证实了余澹

创新成果的临床意义。虽然青霉素问世后,此方法即为青霉素气雾疗法所取代,但它不失为医学史上的一项创新成果。

### 致力于制造抗伤寒血清

1929 年底回国后,余澹担任了北京大学医学院细菌学和卫生学课程教学的教授,同时,还受邀担任国民政府卫生部中央防疫处“技正”一职,专门负责监制防疫的生物制品工作。

1933 年,余澹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来到雷士德研究院工作后,余澹潜心于医学科研和著书立说。

1929—1931 年,上海曾有两次大面积流行霍乱。据当年的《申报》登载:“浦东时疫猖獗,日多一日,昨晚便死去 3 人。”上海也由此数次被宣布为“有疫港口”(据《申报》1929 年 8 月 8 日版)。

余澹到达雷士德研究院后,首先针对当时上海爆发的霍乱大流行展开调研。他通过详尽的调查资料和大量的实验数据发表了《上海霍乱菌的调查》一文,驳斥了一些外国学者关于上海是霍乱菌发源地的错误观点,证实细菌是由国外传入的,还指出从根本上防治霍乱的方法。

随后,他又将目标锁定在了当时另一种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伤寒的研究中。据悉,伤寒自 1923 年开始流行,民国时期也多次爆发。由于抗菌素和磺胺药尚未面世,故伤寒对人类生命安全的杀伤力相当高。在 1930—1942 年间,上海每隔 2 至 3 年便要流行一次,死伤近万人,且病死率高达 59.5%。面对无数生命死于伤寒病这一严酷现实,医生们也感到束手无策。

余澹作为细菌学家,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忘我地开展相关研究。1934 年,英国李斯特医学研究所著名的细菌学家菲利克斯等人发现从新病人身上分离培养出的伤寒杆菌均含有“O”与“Vi”抗体存在于血清中。动物实验证明,O 抗体只有解毒作用,而 Vi 抗体才具有杀菌的功能。第二年,余澹也从伤寒杆菌 Vi 抗原的研究中制造出有效的抗伤寒血清,共治愈伤寒病患者 305 例,并在临床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约有三分之二的病



人中毒症状明显解除，并约有半数的病人体温在逐渐下降。

这一研究成果是一项举世瞩目的医学突破，即使在当下，伤寒杆菌虽然对氯霉素等抗菌素较为敏感，但发生对抗菌素产生抗药的感染时，伤寒血清仍是一个有效的治疗手段。此后，余瀛根据其研究和治疗的情况发表了《伤寒热的血清学治疗》等四篇论文，并且与英国李斯特医学研究所著名的细菌学家菲利克斯搭建起友谊的桥梁，两人经常通过信件往来交流研究成果和经验，并且还交换血清，为伤寒的临床治疗做出了诸多的努力。

在雷士德医学院期间，他还对斑疹伤寒的防治及对疟疾、白血病、人体白细胞减少症等多个领域做了大量研究，并在《英国医学杂志》等权威期刊上发表多篇论著。

### 成功研制麻疹疫苗

20世纪50年代，麻疹在我国属于传染性极高的疾病，尤其在1—5岁的儿童中，传染致病的可能性极强。而且，若麻疹易感染者和麻疹患者有亲密接触，则发病率可达95%以上。据上海人民政府志记载，1952至1965年，上海有7次发病率超过2000/10万，其中3次属大流行。那时，全国每年因麻疹合并肺炎而死亡的儿童至少在五万人以上。

1955年，哈佛大学恩斯特博士首创了麻疹减毒疫苗，并获得了成功。在恩斯特实验成果的启示下，余瀛开始着手麻疹疫苗研究这一重大课题。

1956年，他受邀赴北京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大会，

会上，他提出了题为《研究并制造预防麻疹的减毒活疫苗》的议案，强调麻疹对于儿童和整个家庭的巨大侵害，呼吁全社会给予关注。此次会议通过了这一议案，并把研究麻疹疫苗的任务交给了余瀛。回到上海后，上海即成立以他为组长的麻疹疫苗研制组，还汇集了其他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国内首次制备麻疹疫苗获得成功，试用一年后即大显成效，每年至少可挽救5万以上的儿童免于死亡，也使几百万儿童免患此病。1962年，余瀛发表了题为《麻疹弱毒疫苗的研究》一文，详细总结了有关的经验和效果，此项成果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一致公认。

由于余瀛在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方面的执着追求和不懈努力，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他获得了“在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上海九三

（作者詹耘为九三学社市委原机关干部，季萍为九三学社市委研究室主任，李培勇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主任医师）

余瀛，1903年生于北京，1923年毕业于我国最早的医学院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2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并成为我国第一位细菌学博士。

一级教授，曾任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所长，WHO免疫遗传学合作中心主任；国家和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国际免疫药理学学会理事、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上海市免疫学会第一届理事长、《上海免疫学杂志》主编。

1952年，余瀛加入九三学社。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上海分社委员，是上海市第二至五届人大代表，自1964年起，连续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至五届委员。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0年代贝聿铭来访,与陈从周(左)畅叙。

## 村四楼上课的日子

——怀念恩师陈从周先生

● 刘天华

浪迹天下十三年后,1979年秋,我又回到同济拜在陈先生门下,研读古典园林。那时先生刚刚六十出头,精力充沛,三年中又只带了我一个学生,又正好与其长女同岁,先生待我如子侄辈,故我得常常亲近先生,侍奉左右。今逢先生100周年纪念,想说的话真不少,还是从国画课说起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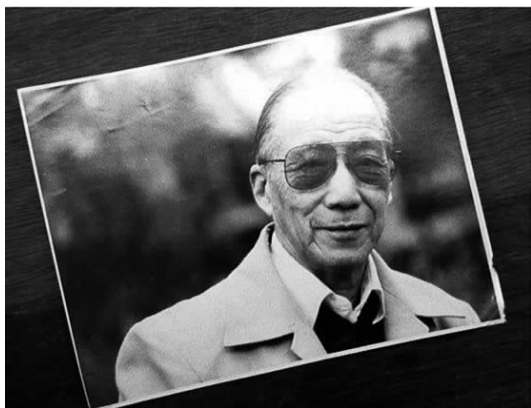
### 有趣味的国画课

1979年春天,我报考了先生中国建筑史专业古典园林研究方

向的研究生。考试科目中指明了报考园林专业要考中国画,我对此有点发懵,于是借一次出差上海的机会,和同学一起去同济新村村四楼拜访陈先生。说明来意后,先生让我们坐进了他的饭厅兼书房,我忐忑地问,中国画范围极广,应该如何准备,如何应考?记得先生一面抽烟,一面笑眯眯地说:“不会考你山水人物,主要是画一些园林中常见的小景,如竹木泉石,搞园林的不会画几笔国画可不行。这是我坚持要考

的。”还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与建筑史、园林史,绘画史、古文翻译、古文作文放在一起考。最后先生还说:“做我的学生,知识面一定要广,许多人有点怕,其实不难的,就是杂了一点,看你底蕴了。”出门告别时,我一身冷汗。

以后的半年里,我找了一位国画老师恶补园林小品小景,因为有大学三年素描水彩课的基础,画得还马马虎虎。考试转眼就到了,因为要考设计,考场设在同济南楼底层的绘画教室内,一人一张大桌



法,我说,我画,你能领悟多少,全凭自己的本领。”还时不时感慨:古人所说“师法其上,得乎其中”,诚不我欺也。有时我会提出质疑:“如果学生都如此,岂不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此时,先生就会瞪我一眼,骂一句“小赤佬,侬懂啥!”

过后想想,跟着先生这样一位诗、书、画均是高手的园林大家,能得其中,已是上上大吉了。

其实先生教授画,还是很有章法的。他让我一开始先练三种线条:直线结合画竹竿,要把直幅画纸横过来,一节一节从左到右,越来越细;曲线是画兰花叶子,先生称之为“撇”,下笔要随意,自由飞舞;圆是大大小小的圆圈,画葡萄、枇杷、葫芦就用此法。先生要求我回到宿舍,三种笔法要重复练上百次,如对待小学生一般,当然他也从未查过。国画课先生示范技法很是认真,他前后曾给我十二幅小品画稿,都是留存画稿中的精品。一次先生教我画山石皴法,随手取来一张作远山皴法示范,后来说到太湖石,又把纸颠倒过来画了一座石峰,我看后爱不释手,一直留到今日。虽不是完整画作,但画稿记录了先生上课之过程,对于我,有特别的纪念意义。

国画课的另一教学方式是观摩,即看先生作画。求先生字画的人很多,学校外事部门又常将先生画作赠予外宾,因此先生有不少时

间花在画画应酬上。作画时,边上要有书童做研墨、拉纸、钤印等辅助工作,这些也成了我学画实践的一部分。这里还要说说先生的闲章。先生喜欢各式各样的图章,集有一大盒,印文各式各样,如“画奴”、“我生戍马”、“我与阿Q同乡”、“梓翁九怪”等,不少求画者还指定要盖这些深有意味的闲章。先生题画也多有意味。记得有一次先生画葡萄,上题“一圈一圈何时了,谁都跑不掉”,左看右看十分得意,当时我不太领悟其意,后来才逐渐品出其中之蕴含。

先生交友极广,上门拜访的人也很多。我因隔三差五往先生家跑,能碰到不少名人。我现在还留有冯其庸先生一副对联,就是在先生家为他们研墨拉纸后,冯先生送我的。有一次我在村四楼门口见先生送别一位白衣长发女子,随先生进屋后看到茶几上一张名片,写着“三毛,陈平”四字,我惊讶地问先生:“她就是三毛?”先生点头后饶有兴趣地拿起名片,说了一段让我难忘的话:“人分几等,名片也分几等,高高在上的人不用名片;有名气的人,名片上字少,越少越有名,如这一张只有四个字,说明三毛蛮有名。名片上堆满字,列着七八条头衔的人最没有花头,是用片子吓唬人,欺骗人。”

先生睿智幽默,经常说一些俏皮话,有时还会引来师母的白眼,说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先生还常常问我一些小问题,考我急智。一次,

子,综合科目考卷有三大张,还夹着一张一尺见方的宣纸。当我答完试题拿出准考证上要求准备的笔墨砚时,周边考生都投来奇怪的目光,连监考老师也觉得新鲜。题目是“枯木竹石图”,按照准备的腹稿提笔作画。因为紧张没有发挥出最佳水平,不过幸运的是先生后来还是收了我。

先生是画坛巨匠张大千的入室弟子,跟先生学画,受他教诲的“画青”少说有十几人。但是按照研究生教育大纲授课,正儿八经教的唯有我一人。后来和年轻一辈说起此事,还真有点小得意。可惜我悟性不高,没学好,想想真是愧对老师了。第一学期有国画课,每周四节。上课时,会先让我把饭桌擦干净,铺上毡毯,然后裁纸研墨。有时先生一边抽烟一边嘟哝:“小赤佬,上我的课还要我倒贴宣纸,以后拿点来。”但我好像一次也没有带去过,因书桌上、墙角边一卷一卷宣纸堆了不少,都是请他作画的人送来的,用也用不完。

上先生的课很随意,他常说:“我带学生是老师傅带徒弟的方

我带朋友去看先生,他正在为画题款,写到笠翁涤翁时,随口问我此二人是谁,我说了“李笠翁”,顿了一顿,边上朋友接口说“石涛”,先生说“你比刘天华强,将来会有出息”。果然,此子后来也成了名家。

### 随先生游历

读研两年半,最开心、最期待的事莫过于随先生外出开会、考察。除了第一学期公共课多,最后一学期写论文较忙,中间大概跟先生外出了七八次,真是羨煞旁人。那时经费少,出差一趟不容易。出差考察时每次就餐,先生和领导、老专家一桌,我喜欢挤在年轻人一桌,席间先生那一桌围着听他聊天,笑声不断。先生博闻广记,风趣幽默,对各地的历史文化、名人轶事信手拈来,能说出不少道道,让大家在佩服之余又为自己的乡土骄傲。

到了晚上,先生似乎比白天更忙,他朋友多,仰慕者更多,所以宾客络绎不绝。当地文化、文博、古建、园林界的熟人、学生,一批接着一批。有时会让先生当场作画,分送众人。先生曾对我说,他的画只送给有缘之人,有的人索画,他会不理不睬,而为他开车的司机、为他烹饪的厨师问他要画,他一定会答应。记得先生有一方闲章,刻有“布衣陈从周”五字,他无官无职,一介布衣,在海内外有那么多朋友,实在是具有不一般的人格魅力。有人说陈从周喜欢骂人,不错,

但他骂的都是那些破坏老祖宗留下的青山绿水和历史古迹的不懂文化的庸官奸商。对于一般劳动者,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先生从来不会横眉冷对,反而是和颜悦色,有求必应。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起步,正是百废待兴,奋力前行之时,城市规划要重新制定。园林、风景区、古建筑都要评估和修复,这些会议都要请先生。另外,先生的《扬州园林》、《绍兴石桥》等著作文稿已初定,还要实地补充大量图片,我跟随先生左右,着实见证了先生的忙碌。先生勤快,出差途中也见缝插针写稿。我记得《书带集》中的《杭绍行脚》、《烟花过了上扬州》两篇都是先生挤时间草就,然后让我誊录。一篇是在西园宾馆开写,到镇江开会时定稿;一篇是在火车上完成草稿,我回学校帮抄的。先生说,这些都是文债,晚报盯着要。也就是这一篇一篇带有专业知识的抒情游记,造就了先生“散文大家”的名声。

时至今日,当年开会的内容多已忘记,但有些小事尚留在脑海中。第一次是去常熟开规划会议,我外祖父曾在常熟中学教书,我从小对这座“十里青山半入城”的古城很有感情。跟着先生一路行来,每逢古迹残园,他都会指点精要,谈掌故沿革,如数家珍。还记得第二天一清早,五点不到就被先生从被窝里拉起,和朋友一起去言子墓附近喝茶的情形。先生说,喝早茶、

吃头汤面是江南古镇的传统,这种文化不能丢。另外还谈到燕园、赵园、曾园的保护修复,反正是问题一大堆,只能慢慢来。今天常熟已是江南文化名城,古园名胜保护得不错。先生当年的良苦用心和呼吁,应该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跟着先生游扬州两次,一次开会,一次为《扬州园林》补拍彩色照片。在扬州,先生朋友极多,旅游、园林、文博界以及市政府里都有,真正是高朋满座,少长咸集。带着一帮朋友,从扬州师院出发,坐着有点旧的工作船游瘦西湖,指点江山,先生是何等的意气风发。记得船过大虹桥时,先生吟出“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周围有人跟着唱和,从此我记住了王渔洋,记住了香影桥(大虹桥别称)。

### 写毕业论文

我的论文题目是“园林石峰研究”,主要研究古典园林中孤赏石峰品评鉴赏、历史沿革、现存状况等。关于选题,先生说过不止一次:写论文要立得住脚,题目要小,挖得深,就像在小河里抓鱼,把水抽干,将所有的鱼虾一网打尽。唯有如此,在学术上才会有机会发发声音。为我选定此题,可见先生良苦用心。其时正值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出版,我一看如获至宝,将中国美学讲得如此透彻,如此深入浅出,实不多见。有此一书,品评一章就较容易写了。难点是先生要我调查历代名峰在各地园林中还

留存多少。所以就在上海图书馆坐了一个月冷板凳,仔细查找各种笔记、各种志书。

第二步是收集资料,江浙是重点,因为留存的古园较多。历史记载中有过名园的城镇,甚至乡村都要去,特别是到一些倒圯的废园中寻访石峰,还是很艰苦的。比较远的是去岭南和北京。先生人脉极广,出门前我总要去他那里领路条,是写给熟人朋友的字条,这比学校开的介绍信还要有用。例如去北京时,我就到单士元、朱家溍老先生家中拜访请教,还拜访了王澐、耿刘同等专家,对我在北京的调研帮助不小。

在准备论文的好几个月中,只要碰到问题,我都会去先生家里求教。他也不嫌烦,一边聊天,一边帮我解惑。记得有一次先生对我说:爱石蓄石是古时文人的普遍嗜好,故宋有《云林石谱》,明有《素园石谱》。但文房清供玩石,终究气派小,园林才是美石的最好归宿。白墙、竹影、枯梅,水中倒影,都是石峰之绝配。后来我论文中就加了“石峰环境”一节。

最终,论文分为文字和图片两集。先生对成果形式要求极严:正文近四万字,要求我手写抄录,最后装订成古书模样;照片也要自己冲放裁剪。这一阶段我吃尽苦头,不过最后,先生还是比较满意的,请他的两个好友给论文题签和刻印。一位是沪上书法名家王京篔,篆书尤为一绝。老先生家在高桥

镇,去一次要大半天。因为和先生商定精装论文要十套,每本均要题签,一共是二十张。虽然笺纸很小,也着实让老先生吓了一跳,说陈从周把他当劳力来使。虽然小有不满,但老人最后还是很认真地题写了。印文“积跬之作”也是先生定的,语出荀子的《劝学篇》,是对我的勉励,由贺平老师操刀。装裱完成后,黑色封面左上方的篆书题签和右下方红色的印文,让文本多了些书卷气,为论文增色不少。记得论文答辩时,看到桌上摆放着古色古香的文本,不少老师都啧啧称赞。

我的论文答辩会由园林界秦斗、南京林学院的陈植老先生任主席,还请到了大画家、苏州政协主席谢考思老先生,谢老还给我留下了书画墨宝。这些全都是靠先生的面子啊!

### 音容如在

九十年代后,先生因中风而行动不便。我因为帮先生编两本书,常去他家中。一本是《中国园林鉴赏辞典》,先生答应主持编写该辞典时身体尚可,并指定让陈门弟子均参与,但因组稿工作量大,拖了近十年。先生谢世前此书刚刚付印,没能让先生看到成书,实为一大遗憾。另一本是《园踪》,是先生和其内侄一辈子收集整理的古代园记。稿子都为手抄本,有一尺来高。为寻求出版社而几经周折,最终还是由同济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彼时两位老先生均已仙逝。

1993年春,上海电视台来我工作的上海社科院找我,说要拍一部系统介绍先生的纪录片,这是文化抢救工程的一部分。当时先生已得病,一切都必须抓紧,于是我放下手头所有工作,一心一意写剧本,几易其稿。纪录片原先取名“园林大师陈从周”,大家都觉得此名不亲切,有距离感,最后定名为“吾师从周”,由我以弟子的口吻来讲述。因行动不便,先生出镜仅局限于家里和豫园,其余外景则只能旁白。作为编剧,我跟着团队走了不少地方。最远至昆明安宁,又采访了几位先生的亲朋好友,从侧面来丰富先生形象。这次纪念先生100周年诞辰,将碟片交至学校前,我又看了一遍,内容尚满意,仅视频有点老化,不够清晰。能为先生留下一段较完整的形象资料,还是很感欣慰的。

回想起来,先生对我期望还是挺高的。在去社科院报到前,我去向先生辞行,先生送了他的第一本文集《园林谈丛》给我,并提笔在书上写了“由来秀骨清,我生托子以为命。天华从余游,适是书新刊,采杜诗赠之,谊见于斯矣”,令我感动莫名。回头看看,实在汗颜,真的愧对恩师。

而今,我亦老矣,喜见先生学术在母校同济开枝散叶,想来诸位师弟和先生的再传弟子们一定会不断努力,开创陈学研究的新天地。■上海九三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室原主任)

## 忠魂永驻青草沙

当你在炎炎夏日回到家中，惬意地喝上一杯优质的清水时，当你在周末乘坐私家车，和家人一起驶过南隧北桥，上崇明岛度假时，当你通过现代气派的浦东国际机场，飞往世界各地时，你是否知道，这一切都得益于一位老科学家？他在青草沙水源地选址、浦东国际机场选址和南隧北桥方案的建议上，为上海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60年来，他践行自己“服从真理，揭示自然，承担重担”的理想，取得了一系列造福世人的科研成果。他就是主持建造崇明青草沙水库的九三学社社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院教授陈吉余。然而令人感到悲伤的是，2017年11月28日，陈先生因病去世，享年97岁。

### “敢于讲真话”是他的人生信条

涨落起伏的潮水、细软难走的泥滩……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是陈吉余一生最牵挂的地方。“我和长江口打了50多年的交道，我是亲眼看着它如何变过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变，将来会怎样变，我心里有个谱。就像老的航海人，从水里捞出一块泥，手里摸摸、嘴里尝尝，就知道在什么地方了。”在陈院士生前接受采访的话语里，透着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智慧和自信。

陈吉余先生出生在书香世家。他曾回忆：“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亲人是祖父。”他的祖父陈百川是清朝的举人，后被公派到日本留学。学成归国后，陈百川在家乡出资创办了一所小学——百川小学，陈吉余当年就在校就读，年幼的他在那里第一次展露了他的地



理学天赋。当时，祖父在他的床头挂了一幅中国地图，“我每天一有空，就看这幅地图。”在玩儿的过程中，当时全国2000个县的名字，陈吉余几乎都记得。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吉余为了继续求学，一路辗转来到湖北沙市，就读于江苏多所中学组建的联合中学。在重庆，他读完高中，考取了浙江大学史地系。当时的浙大，地理学大师辈出，竺可桢、张其昀、叶良辅……他们的精彩讲课和人格魅力，让陈吉余对地理这门学科愈加如痴如醉。

对陈吉余影响最大的老师是叶良辅教授。这位地质学家虽然身体不好，但仍然带学生去野外考察，指导他们研究地貌。1946年，叶良辅还让陈吉余参与钱塘江地质调查项目，把他领进了河口海岸学这一研究领域。“所谓河口海岸学，就是研究在海陆相互作用条件下，河口海岸的演变规律和河口海岸的生态环境。”陈院士生前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解释道，“河口海岸是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的前沿，所以这门交叉学科对国民经济、国家安全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浙大求学期间，陈吉余还与李四光有过一段师生之谊。

陈院士回忆说,那是在他写学士论文期间,他来到贵阳的贵州地质矿产测勘处,研究当地的山地地形,恰巧李四光也在那里。听说这个学生是研究地形的,李先生便带他在那一带考察了一天,并借给他一本自己写的尚未出版的书《冰期之庐山》。1947年,李四光来到杭州,带浙大史地系的师生进行了地形考察,提出了他的“杭州冰川学说”。然而,年轻的陈吉余对这位大科学家的学说并不认同,他撰写了一篇文章《冰川置疑》,指出这个理论的论据存在不足。结果,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杭州冰川学说”也就没有继续发展下去。

谈起这段往事,陈院士曾感慨地说:“浙大的校训‘求是’对我的影响很大,求是就是求真理,科学研究如果不求真理,服从权威,那不就成了伪科学吗?所以科研人员要敢于讲真话。当年,对于李先生的学说,我想我有质疑总是应该提出来,科学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

### 献毕生精力服务民族科学事业

陈先生在其漫长的学术研究道路上,不断开拓进取,发展了以动力、沉积与地貌相结合的河口海岸学科体系,并扩展到环境、生态及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等研究领域。同时,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河口海岸研究所和河口海岸国家重点实验室。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因国家长江口港口和航道建设的需要,陈先生等承担了长江河口槽演变、浏河新港选址、长江口深水航道选槽、长江河口三沙治理等研究,陈先生和大家一起沿江进行岸线调查和水文测验,在完成国家任务的同时,还于1979年发表了在学术界和工程界最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之一《长江河口的发育模式》,对指导以后长江河口的开发利用起到了巨大作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上世纪90年代,在浦东国际机场的选址问题上,他建议把机场建在海堤外的滩涂上,这样可以为上海节约大量土地,而且不会对周边居民区造成噪音污染。“发达国家建机场也遵循这个思路,比如美国纽

约的肯尼迪机场就建在海滩上。”为此,并未参与机场选址工作的陈吉余写了一封信,交给了时任上海市长的徐匡迪。一周后,他就接到通知,说有关部门认可了他的建议,表示堤外的滩涂要充分利用。这项建议绝对是“金点子”,机场场址由此向东平移640米,可少征农田约7488亩,少征农田后增加了滩涂填土费用,两者相抵,陈吉余的建言相当于为国家节省投资3.6亿元人民币。在该建议得到采纳后,陈吉余又提出,机场占用的堤外湿地是鸟类国际迁徙路线上的一个重要“驿站”,既然把这块地占了,就应该在附近的某个地方“种青引鸟”,作为对鸟类的生态补偿。“我们做河口研究的人,不能只管人,不管自然,要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造机场把鸟赶跑了,就得为它们另安排一个去处。”这个为鸟儿着想的建议也得到了采纳。于是,陈吉余开始主持“九段沙生态工程”,和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将芦苇等促淤植物引入这个长江口新生成的沙岛。如今,水草丰茂的九段沙湿地,已成为鸟类迁徙路上的一个乐园。

1990年,为解决上海市的供水问题,市政府向上海科协高级顾问委员会咨询,面对各方异议,陈吉余坚定地阐明向长江引水的必要性,率先提出利用青草沙修建江心水库,用地下管道输送陆地的建议,并做出水库和管道工程的初步设计方案。他当时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敢在大型河口直接建造水源地和水库,而青草沙正是建在长江口,处于海水和淡水的交汇区内。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监测系统,观测长江咸潮的变化。”面对咸水入侵这个难题,市科委、市建委也通力支持,经过10多年努力积累和观测,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咸潮资料数据库,这块优质水源地的建设,可谓水到渠成。

2010年,他向上海市领导递交了一份报告,指出长江流域的现状——上游蓄水、中游拦水,下游引水,加上跨流域调水,势必会对上海的供水产生影响。为此,他建议本市开展长江河口的系统监测、综合研究。这份报告得到了俞正声书记、韩正市长的批示。

青草沙水源地建成后,依靠其庞大的水库“避咸蓄淡”功能,上海每年冬季遭遇各种不利气候条件时,长

江咸潮袭击后只要水库提前蓄满水，可保证向供水区域持续输水 68 天，市民不会因为长江原水变成咸水而担心供水中断或不能饮用。随着通水覆盖面的不断增加，最终整个上海外环线以内 80% 的居民，都喝到了来自青草沙的优质长江水，直接受益人口达 1000 多万。

### 教书育人是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在河口海岸学科建设的一开始，陈先生就高瞻远瞩跳出传统静态描述的框框，引导大家走动力、沉积、地貌相结合的研究道路，在研究方法上坚持现代过程与历史过程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把动力因素注入传统地学，赋予地学新的活力，这为学科特色建立奠定了基础。随后，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陈先生深切地感觉到要进一步揭示河口海岸地区的海陆相互作用和各种物理、化学、生物等过程的时空分布和变化规律，就必须汲取其他学科的营养，这也是学科不断发展的关键。他果断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领域引进人才，组成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队伍，并在全国海岸带资源综合调查的实践中，成功地通过多学科磨合和交叉渗透，使我国的河口海岸科学研究向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和沉积过程全方位拓展。他支持青年学者从事泥沙运动、海洋遥感、近岸水动力学、物模与数模、生物地球化学、河口生态、海岸工程、数字海岸等方面的研究，使我国的河口海岸学科形成了具有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特色，并造就了一支强有力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学科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陈先生就力主河口海岸学科发展必须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选派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去国外学习深造。通过学术交流，吸取先进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使大家开拓了视野，使我国河口海岸科学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沿。

陈先生在河口海岸学科发展过程中，一直将教书育人和人才培养放在重要位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所就有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是陈先生一手培育和精心扶持成长起来的。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河口海岸方面的研究人

才匮乏，陈先生深感培养我国河口海岸研究人才队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亲自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年轻的河口海岸研究学者，并分配到全国其他有关研究机构。他发起成立河口海洋学会、出版专刊，推动全国学者进行研讨交流，使全国海洋河口研究人才队伍迅速成长。

不少青年学者的成长也得到陈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精心的爱护和培养。每当他们在学业上、工作中遇到困难、受到挫折，总是能得到他的关心和鼓励，并在个人事业发展上给予指导和帮助。陈先生曾领导全国海岸带调查、曾任教育部科技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海洋、大气、地理、环境学科组组长和召集人，不少外单位的年轻同志在事业发展上求教于陈先生，陈先生都能以宽广的胸怀和助人为乐的精神给予热情的关心和扶持。

陈先生先后参与对全国 20 多个港口开发的研究、咨询和论证。在这些过程中，他认真负责，引用刘济舟院士的话就是：以他的远见卓识和勇于负责的精神，提出积极建议，更可贵的是提出不同意见，很多独到新意的建议，得到采纳。比如，在连云港扩建、黄骅港建设论证中，他系统总结了淤泥质海岸剖面塑造理论，提出“浅水深用”建港方案，在人们认为难以再扩建和建设的连云港、黄骅港建设中得到了检验。又如，在丹东大东港建设论证中，他提出选定西水道建万吨级港的正确意见，为部门领导所采纳，促进了大东港的建成。

长江三峡工程，规模宏大，举世瞩目，有许多科学问题需要论证，其对河口的影响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陈先生作为课题负责人组织着重对三峡工程可能导致的盐水入侵、河槽形变、海岸侵蚀等问题进行研究，做出定量结论，对河口生态问题做出定性的报告。并特别直言指出了三峡水库蓄水时期河口盐水入侵的问题应予以重视。

陈先生曾说，作为民主党派成员，要与执政党荣辱与共，相互监督，要敢于讲实话、讲真话，虽“忠言逆耳”，但利国利民。无论在国家建设还是在社会发展中，都应当主动担当责任。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陈吉余院士，永远是我们的榜样。■上海九三

（本文摘自《风瀛洲》）

## 伟大的预演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筹建与上海

● 朱少伟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这是18年后新中国伟大的预演，举世瞩目。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昔日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红色国家政权，许多筹备工作在上海进行，并有惊心动魄的故事。

### “南洋归侨”悄然抵沪

1929年秋的一个深夜，黄浦江畔马路两旁的路灯昏暗，已泛黄的梧桐树叶在风中微微抖动。

坐落在上海爱文义路690—696号的红色砖木结构俄式洋房（位于今北京西路、石门二路口，原建筑已不存），悄然住入一户“南洋归侨”，他们就是扮成夫妇的林育南、张文秋。林育南年仅31岁，先前曾担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北省委代理书记，秘密工作经验非常丰富，身负特殊使命；张文秋是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沉着镇静，灵活机智，作为他的助手。两人明知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申城与敌人周旋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却无所畏惧。

中共六大后，中国革命运动开始出现新的转机，尤其是曾受大革命影响比较深的南方几个省区，革

命形势趋于高涨。此时，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申城，中央政治局机关设在上海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林育南接受特殊使命，化名“赵玉卿”，与张文秋（化名李丽娟）一起来到黄浦江畔。他们经过反复察看，爱文义路上闹中取静的俄式洋房共3层，总面积433平方米，前有院墙和铁门护卫，内有树木遮掩，后有幽径可通，既气派又隐蔽，完全符合掩护秘密工作的需要，经过中共中央领导同意便租下它作为机关，对外称为“赵公馆”。很快，林育南把房屋装饰得像富商的住宅：底层用于生活起居，陈设着各种日用品和高档家具；楼上两层作为办公、开会的地方，临街的玻璃都装有墨绿色厚窗帘。

林育南在这里开展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筹备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1921年8月，中共中央在沪建立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翌年迁往北京），林育南曾是武汉分部主任，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为了使全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从1922年开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全国劳动大会，前



林育南

3次均于广州举行，第四次在汉口举行；而第五次则随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从北京迁到上海，放在申城举行。虽时间紧迫，但林育南凭着对党的忠诚和满腔工作热情，很快使一切就绪。

1929年11月7日，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上海“赵公馆”秘密举行。出席会议的29人，代表10多个地区及铁路、海员等产业的赤色工会会员3.98万人。中共中央向大会发来祝词，对“全国革命运动正在复兴时期”的工人运动提出七大任务。会议开了5天，会场始终充满“热烈、勇敢、坚决斗争的情绪”，“这种热烈讨论的会议精神，实为二三年来少有的现象”。前几天是小组会，最后一天举行全体代表大会，由项英作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报告，上海工联合会代表团作从5月以来上海工人运动的形势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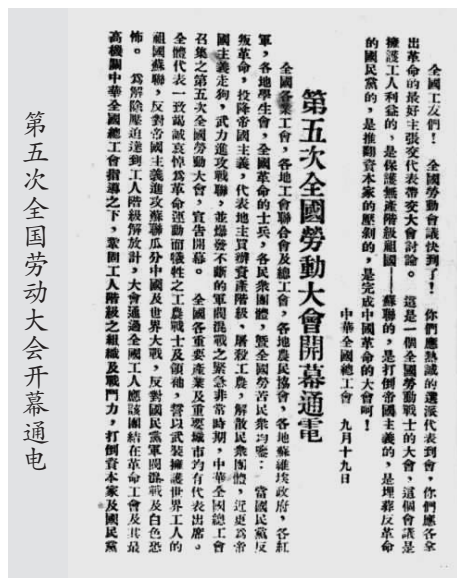
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工人斗争纲领》《工会联合决议案》《农村



原北京西路 690-696 号俄式洋房外貌



原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旧址外貌



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通电

工人工作大纲决议案》等 12 个决议案及《告红军将士书》《致赤色职工国际及世界各国工人书》等 13 项通电。大会确定：加强同农民的联系并结成坚固的革命同盟，是中国工人在目前革命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27 人、候补委员 18 人，选举项英为委员长，罗登贤任党团书记，林育南为秘书长。这次会议是在革命力量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下召开的，强调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重视加强工农联盟、扩大赤色工会，成为白区工人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 “赵公馆”内运筹帷幄

在上海成功筹备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使林育南经受了一次锻炼，积累了不少新的经验。接着，更艰巨的工作等待着他。

1930 年上半年，在湘、鄂、赣、闽、粤、皖等省有 18 个区域 127 县成立了拥有 1400 多万群众的苏维埃政权；全国红军已扩展到 14 个军近 10 万人；农民土地革命不断深入与扩大；全国工人罢工浪潮起伏彼起；反动军队的兵变现象与日俱增。于是，中共中央把建立全国性苏维埃政权作为一个中心任务，提到全党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来。

2 月 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国苏代会的准备工作；会上，周恩来建议：全国苏代会以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

总工会名义发起，组成四五人的筹备委员会，全总、军委、农委、组织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及共青团各派一人为委员，获得同意。2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向全党通报了自中共“八七”会议以来全国苏维埃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宣布将召开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以统一中国革命的指导与行动”，“大会的布置将由发起者通知各地，中央拟定各苏维埃区域及红军中的重要代表，将先集一地开一预备会议，讨论并起草一切议案，然后再开大会于某一被指定的苏维埃区域”。各革命团体纷纷发表宣言，热烈拥护和响应。全国苏代会筹备委员会随即在沪设立，林育南担任秘书长，张文秋、彭砚耕为秘书；2 月 7 日，会议召开，周恩来出席并作报告，对大会日期、代表名额分配、会议议程和决议草案等进行了说明。因中共中央驻申城，也考虑到上海通讯发达，又有人员集散和生活安排之便，便确定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沪举行。

由于林育南的精心安排，1930 年 5 月 5 日至 10 日，在“赵公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57 人出席；其中，有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闽西、鄂东、左右江、湘鄂赣边、鄂豫边、赣西南等苏维埃区域的代表，红军各军和各游击区域的代表，各

赤色工会和其他革命团体的代表。

倘若说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人数比较小，那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规模就比较大了。林育南认为上次会议虽严格保密，但或多或少会已引起外界注意，所以对此次会议做了更缜密的应急预案，还在上海三马路 222 号东方旅社(后门牌为汉口路 666 号，原建筑已不存)设立一个联络处。

果然，会议开到第四天，一批密探在傍晚前来敲门，随即气势汹汹地拥进庭院。临时扮成“花匠”的一名工作人员见状，故意在楼下大叫：“你们这群人太野蛮，我的脚被踩到了，哎哟哟，疼死啦！”

这些密探冲上楼，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位穿戴讲究的老人端坐中间，有两个小孩在给他捶腿，亲友们则恭恭敬敬地向他拜寿。

这时，西装革履的林育南对领头的麻脸密探说：“哟，探长来了。您也晓得我家老太爷今天做大寿啦？欢迎欢迎，晚上有‘燕云楼’大师傅做的寿宴，咱们一道喝几杯，热闹一下！”

麻脸密探愣了愣，头一歪嚷道：“有个‘包打听’来报告，说这里出现不少陌生人。兄弟端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饭碗，就管这个地段，不能不跑一趟呀！”

“探长已是熟人啦，平时一直关照赵公馆！”穿着旗袍的张文秋走过来，朝临时扮成“娘姨”的工作人员招了招手，从端来的托盘里取出“大上海”牌香烟分给特务们，又

塞一些钞票给麻脸密探，“这里都是自家亲友，没一个外人。探长尽管放心好了！”

“嘿嘿，相信赵老板是规矩的生意人。实在是职责所在，打扰了！”麻脸密探打量一下，觉得没什么可疑之处，便利索地把钞票放入口袋，皮笑肉不笑地拱了拱手，“祝赵老太爷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弟兄们还有别的公务，走啦。”

“花匠”看着这帮家伙出门离开，“呸”了一声，关上铁门。他回到楼上，轻声说：“没问题，都走了。我再下去盯着。”

突然闯入的密探看不出任何破绽，只好悻悻而去。预备会议得以继续举行，大家听取了政治报告、关于职工运动与全国工人斗争趋势的报告、关于农民运动的报告、关于红军的报告、关于苏维埃的报告、关于土地法劳动法令的报告、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报告等。代表们对上述报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初步通过了一些决议草案，为正式会议作了具体的准备。正是由于林育南考虑得周全，预备会议完成了各项议程。

### “私立医院”巧设会场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刚结束，林育南就反复斟酌着正式会议如何举行。那天深夜，俄式洋房窗外卡德路（今石门二路）上蓦地传来一阵刺耳的警车怪叫声，有点令人恐怖。他索性跃身起床，到隔壁房间敲了敲门。

“我正要找你呢。”张文秋也未睡，马上开门说，“有些事，还需要再好好商量一下！”

林育南说：“预备会议期间已招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密探的骚扰，应改变原来的计划，把正式会议移到更安全的地点。”

两人商量了一会儿，都觉得对会场地的选择，必须慎重考虑；对会场的掩护，必须万无一失。他们决定尽快与中共中央特科总务科联系，说明情况。

第二天，林育南和参加会议筹备的工作人员与中共中央特科总务科的同志紧急碰头。中共中央特科总务科的同志通报：“由于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涉及面广，可能走漏了一点风声；近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派出大批特务，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密探也四处活动，企图搞清会议的确切日期和地点。”

林育南谈了自己的设想：“最危险的地方，也许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不妨‘险中求安’，把会场放在闹市中心的楼房里。”经过研究，大家都表示赞同。

对于如何伪装会场，中共中央特科总务科的同志说：“采用以前用过的方法，如办旅馆、舞厅、咖啡馆等，恐怕都不稳妥。因为，那样难以回绝涌入的顾客。”

林育南想了想，提出：“我看，用‘私立医院’名义来掩护会场比较合适。这样，既有人上门，却又不多，还可找理由打发值得怀疑的对象。”大家认为，这个建议比较可行。

1930年5月中旬,上海卡尔登大戏院(上世纪50年代初更名长江剧场)背后的一座4层楼房(后门牌为黄河路41弄2—8号,原建筑已不存)悄然挂出“私立医院”牌子。它的底层是“挂号”和“门诊”间,由中共中央特科总务科成员驻守;楼上则有“病房”,“医生”和“护士”都是工作人员。与会代表装扮成“求医者”,陆续“入院”,有的戴着口罩坐“祥生”出租车过来,有的额头绑着绷带坐黄包车过来,有的撑着拐杖走过来,有的躺在担架上由“家属”抬过来。据何长工回忆:在楼下放了不少汽油、酒精桶,以备不测;楼后租了一些汽车停着,万一敌人突然闯进来,就点燃汽油、酒精加以阻碍,使与会人员能从后门迅速撤离。

1930年5月20日至23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就在这个“私立医院”里召开,与会代表近50人。代表们在开会时,装成集中“听保健讲座”的样子;用餐时,吃的是附近小饭馆代加工的“病号饭”;休息时,入住“病房”。在会场四周,中共中央特科总务科的同志则分别扮成“香烟小贩”“擦鞋匠”“黄包车夫”等,负责警戒。

在会议间隙,一位红军将领诙谐地说:“国民党当局恐怕做梦都想不到,我们就在大上海的密探、特务眼皮底下开会,商议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一位工会干部幽默地说:“虽然马路上到处是密探、特务,但这

些家伙在久经考验的地下党组织面前,只能成为一群乱转的无头苍蝇——找不到方向!”

一位农会女干部风趣地说:“我看,这帮饭桶唯一能做的,最多就是在会议结束时来为大家送行,哈哈!”

这些话,把代表们都逗乐了。林育南笑道:“我们虽作了巧妙布置,但情况是复杂的,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啊!”大家表示一定自觉严格遵守会议纪律。

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期间,未到会的瞿秋白、毛泽东、彭德怀、贺龙、朱德等10人,被推举为大会名誉主席团;由项英、周恩来、李立三等13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立三致开幕词,他表示召集这次大会是“要使每一个革命的群众都了解苏维埃政权的意义,都起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次大会的成功,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先声”;他还代表中国共产党作政治报告,阐述党对政治的估量和总的策略及任务,以及苏维埃大会的政治任务。大会宣布了全国苏维埃政府的十大政纲,讨论通过了一批文件。5月23日,大会主席团最后一次会议还决定:11月7日在沪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同时,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领导“一苏大”的准备工作。这次代表大会对于沟通全国苏维埃区域和红军之间的联系,统一苏维埃的政策法令,动员全

国人民投入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由于安排得当、守护严密,直至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闭幕,疯狂的密探、特务才发现会场位置,偷偷摸过来。然而,代表们早就疏散,已人去楼空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代表柔石曾怀着激情写下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署化名“刘志清”,发表于9月10日在沪创刊的“左联”机关刊物《世界文化》,其中生动记述了自己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时的所见所闻,倾诉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对革命根据地的热爱和对胜利的向往;为此,杂志编者在《编辑后记》中说:“刘志清君的《一个伟大的印象》的通讯,不但是难得的报告,又是很好的文学作品。”

### “家庭成员”配合默契

1930年7月23日,由中共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革命互济总会、上海总工会、反帝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代表组成的“中准会”临时常委会,在沪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准会”工作计划,议定了“中准会”临时常委会职责,确定了办公地点和工作人员。7月30日,“中准会”临时常委会向各党团组织、苏维埃区域和革命团体发出了选派代表来沪参加“中准会”的邀请函。

“中准会”临时常委会由李求实担任党团书记,林育南担任秘书

长,工作人员有张文秋、彭砚耕、李平心、胡毓秀、冯铿等;机关设于上海愚园路庆云里31号(后门牌为愚园路259弄15号,原建筑已不存)。这里位于静安寺旁边,是林育南以化名“李敬塘”租下的,系一幢3层石库门房屋,面积160多平方米。为了便于隐蔽,这里按照阔绰皮货商的排场来布置,并在表面像一个“大家庭”,工作人员对外皆称亲戚,如李平心、胡毓秀夫妇以“李老板”的“表妹夫妇”名义寓居于此。“家庭成员”志同道合,配合默契。有一次,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密探到庆云里转悠,还挨家挨户检查,大家装着在一起打麻将,沉着应付过去。

在险恶环境中,林育南既坚持原则,又机智果断,他出门办事时或装成服饰考究的学者名流,或装成衣衫褴褛的工人,巧妙和灵活地与敌人周旋。由于静安寺香客众多,他曾在此与江西瑞金来的同志接头;在“当当”的洪亮钟声中,顺利交换了重要工作信息。

“中准会”临时常委会的一项极重要的工作,就是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一些法令草案,林育南与几位承担任务的同志在庆云里常夜以继日地忙碌。

这天中午,一位老板模样的人走进来,问这里有没有空房出租,有没有人可做保姆。“李老板”客气地进行寒暄,回答得滴水不漏。

“哈哈,好一个‘李老板’!”老板模样的人拿下墨镜、扯掉假胡子

说,“林育南同志,你的警惕性很高,这里确实比较安全呀!”

林育南这才发觉,站在面前的竟是在沪实际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连忙握紧他那双有力的手:“您来了,太好了!”此后,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又多次前来指导文件起草,对主要内容和具体条款都提出过明确意见,还曾亲自动手作修改。另外,瞿秋白、李维汉、任弼时、恽代英、王稼祥等也对这项工作很关心,曾参与商量。

1930年9月12日,“中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以及《劳动法》《土地暂行法》草案等一系列文件;又鉴于准备不够充分,决定把原计划于11月7日在沪召开的“一苏大”日期推迟,并改在江西瑞金举行。9月19日,在沪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发表社论《论召集全国苏维埃大会的运动》指出:“在我们今天的《红旗日报》上,我们见到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经过,决定了关于准备召集全国苏维埃大会的议事日程、中华苏维埃国家的根本法草案……这些决议,在现在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猛烈发展的形势中,都具有了非常伟大的重要的政治意义。”

至此,林育南已出色地完成了特殊使命。同年冬,林育南曾带着这批重要文件前往江西瑞金,由于

道路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他在浙江衢州等待多日,不得不中途返回申城。

### “魔窟”难摧英雄壮志

1931年1月17日至21日,一些党的重要干部和左翼作家先后在东方旅社等处被捕,很快被转押到位于龙华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其中,有林育南、李求实、彭砚耕、柔石、冯铿等,虽在“魔窟”受尽酷刑,依然坚贞不屈;2月7日晚,他们一起英勇就义,被称为“龙华二十四烈士”。周恩来得知这个噩耗,在《群众日报》发表了《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沉痛悼念这些在龙华牺牲的同志和战友。

“中准会”机关的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不得不搬离庆云里。尽管如此,林育南具体负责起草的文件最终仍被完整地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并由同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一苏大”审议通过,对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著名学者喻权域将上述文件带往加拿大出席中加两国联合举办的人权学术会议时,当地专家、学者看了很吃惊,他们认为:中共在30年代领导制定的法律文件,西方许多国家直至90年代尚未达到那种水平。这也表明,林育南等同志具有非凡的革命智慧和超强的工作能力,不愧为早期党的优秀干部。上海九三

(作者为上海浦东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 新 社 员 名 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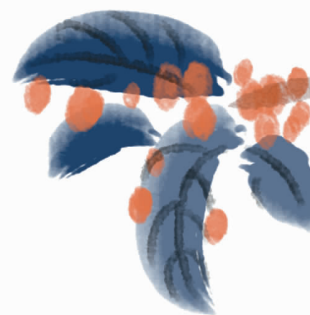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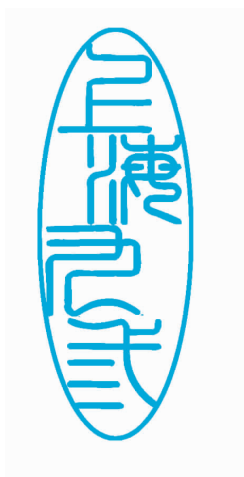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 2018 年 7 月 30 日主委办公会讨论通过。

王辉俊	赖志强	陈立军	吴 庆(女)
楼 聘	李莹琦(女)	单国洪	徐建生
袁晓梅(女)	殷向红(女)	侯峰迹	沈小红(女)
胡 亮	高 蕾(女)	朱 睿	丁美芳(女)
陈于舟(女)	姜庆超	陈广锋	王淑萍(女)
刘 君(女)	谢少伟(女)	李京阳(女)	秦丽萍(女)
李 超	张 鹭(女)	张昕鹏(女)	黄细霞(女)
何 适	韩 鑫(女)	宋璟瑶(女)	陈 浮
王剑刚	金 彦	袁其章	栾励妮(女)
潘美芳(女)	张 铭	蔡雪松	虞修简
廖麦青	俞谨修(女)	王 茵(女)	姚 宁(女)
张宏超	曹 飞	陈德源	陆建军
杨 斐	杜永宏	苏永东	巫海颖(女)
魏旭锟	廉 隅(女)	章 梦(女)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 2018 年 8 月 31 日主委办公会讨论通过。

江 波	张悦琮(女)	刘昕畅(女)	孙传奇
肖 惠(女)	张志明	秦嘉玮	葛书华
陈 新	吴若楨	张紫旭	戴 丽(女)
缪宇昊	李晨曦(女)	汪维定	戴昌龙
徐 磊	戴翼昊	袁培玲(女)	周 斌
吴正沐	邱 蓉(女)	黄良波	夏晓婷(女)
夏 震	徐雨笠	张鹏程	徐霁茹(女)
王潮华(女)	康 捷	张 燕(女)	朱志强
宋晓虹(女)	许 楨(女)	陆 标	何双珠
敖 翔(女)	袁彬璋	朱纯逸(女)	梁菊梅(女)
沈家东	张孝华	曹 依	周代伟
张 驰	刘金光	龚 丹(女)	朱家辉
姚霄迪	汪 力	吴 骥	卓世昇
贾 欢	朱来宽	范 聪	沈 睿
王自强	任 运	袁 芳(女)	郭慕华(女)
苏 峰(女)	甘 恬(女)	黄 炜	杨肇宁
石彩霞(女)	张 辉	陈 桓	唐晓磊
徐 欣	刘 燕(女)	董万奎	展霄嵘(女)

(以上资料由社市委组织部提供)



SHANG HAI JIU SAN

网址：[www.sh93.gov.cn](http://www.sh93.gov.cn)  
宣传部邮箱：[xchb93@163.com](mailto:xchb93@163.com)

